

柄谷行人 談政治

小嵐九八郎 ◎訪談紀錄

林暉鈞 ◎譯

盧郁佳、龔卓軍

聯合推薦

PsychoHistory 005

柄谷行人谈政治

作者◎柄谷行人

访谈纪录◎小岚九八郎

译者◎林晖钧

简体横排重置• 知乎 @岑南 official @带带布布哥 @夏瞳 (横排时因赶进度, 将大部分西文删除) (文中的“=”代表连字符)

【推荐序】柄谷老师教你第一次逃狱就上手——卢郁佳 9

译序 I ——林建韵 15

第一章 60 年安保斗争与全共斗运动

1 1960 年与 1968 年的差异 20

2 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的重建 31

3 安保斗争以来的观察 42

第二章 思想之路

1 六〇年代 52

2 走上文学批评之路 61

3 一九七五年前往美国 66

4 朝向后现代主义批判 73

5 1989 年走向康德 80

6 波斯湾战争时期 99

7 新 Association 99

8 911 事件的当时 109

第三章 现状分析 119

1 历史与反复

2 为什么以 120 年为周期? 131

3 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147

4 帝国与帝国主义 147

5 革命与和平 155

6 如何因应日本的现况 165

第四章 关于文学 183

【访谈后记】折服于柄谷行人先生的热情! - - 小岚九八郎

【附录】1968 大事记

【推荐序】柄谷老师教你第一次越狱就上手

卢郁佳

「问题是，以往我国国民头上张着十重二十重看不见的网，现在国民还没有完全从那些咒缚中解除。」「顺应时势的心理，限制了日本现在的民主。」 「不断对权力问『why』，民主才会稳固扎根。」 --- 丸山真男

台湾有三大风土病：肝炎、近视，如顽垢随处黏附的封建流毒。新闻充斥「小S拼生男」之类的过敏原，「事业线」报导之多，定位客层显然是我的小脚曾祖母(歿)而不是我：百年前台湾娶媳，不问新娘美不美，而问脚是不是够小，小脚就是美。当年的「事业线」就是裹脚布，今天也一样。想知道人权上台湾离二一十世纪有几光年远吗？

比如说，西班牙根本没有丑女这种概念，不管谁只要肯笑一下就是美女了，大把男生追求；而台湾是所有人最好都识时务假设自己是丑女，不进则退，各种裹脚产品训练女生自恨不够拼，不够美，不够瘦，不够聪明，不够笨，不够随便，太随便，哪个理由都可以，重点是说服妳接纳而已，地位低贱，相信每天吃屎都是自找的。这个秘密就是：今年并不是民国一百年，其实是宣统一百〇二年。每天醒来就发现自己又回到这个恶梦之中继续接关，老子在这里连一分钟都活不下去，只能咬牙发誓：我一定要逃出清朝。如果这是《基度山恩仇记》，柄谷行人就是住我隔壁的资深牢友。这是《绝地任务》，柄谷就是识途老囚史恩康纳莱。在《笑傲江湖》就是任我行，关在西湖地牢刻他的吸星大法，等令狐冲来学。啊啊！不管怎样他都要帮我逃出生天。

一开篇柄谷说「法国的现代思想，其实是一种政治挫折的表现」。现实上做不到，所以就转移到观念的世界里进行革命，「认为如果改变了对世界的解释，世界也会跟着改变」，德国的观念论，也是知识分子无法跑上街头革命、困居书斋所产生，反而引领了康德到马克思飞跃的哲学革命。

这是柄谷在历史上对应的本命星座，他选择继承的事业。他大学时参与学运，目睹千载难逢、直接民主改变国家的浪漫希望；但像《九降风》等青春电影总急转直下、成员意外猝逝，前学运共產主义者竟以恐怖分子式的帮派清理门户、自相残杀新闻震惊社会。新闻画面应该会用爆裂字体打上「变调的青春1」之类蠢话吧。同为学运世代的村上春树，至今都还把「这种人」拿来充当小说《1Q84》中的大魔王角色。在结局带塞过程之下，可想而知，共产主义、马克思当时是怎样免斗就自然臭，人人掩鼻，被舆论作废盖「无效」。柄谷却没有划清界限，默默捡回来洗干净，想办法利用，也就是做解释工作，让马克思继续替大众照亮这个时代的真相。

他一再阐释，在商品供过于求的世界，企业为了继续卖掉人们已不需要的商品，陷入互相胁迫的技术革新。举例说明，苹果公司挑起业界「更轻、功能更多、更便宜」的军备竞赛，宣布该丢掉笔电，买 iPhone；丢掉 iPhone4，买 iPad2；丢掉 iPad2，买 iPhone 5，丢，买，丢，买。没人告诉你苏州胜华工厂一百三十七名工人因生产 iPhone 而正己烷中毒，伤残得不到赔偿。它便宜，是因为从原料开采、制造到废弃毒害的社会成本都不算在内，短片《东西的故事》揭露了这「进步」的隐藏代价。

柄谷寄望身兼劳动者的广大消费者用钞票投票，对商品、企业行使选举罢免；生产和消费能团结协调互利，而不是现在像吴宇森电影拿枪互抵下巴逼死自己。靠着限定区域内通行的地方货币/信用体系，防止金钱上瘾者过度囤积集中、或跨国套利金融风暴，这方面村上龙曾用小说《希望之国》作为蓝图。

消费者运动、地方货币，都可说是建立区域互助「共同体」的工具。资本主义透过国家爪牙，拆毁原本保护个人的互助组织(宗教、村落、帮派、亲族)，好把农民赶出那块养他的地，把土地、劳力变成商品。员工没办法反抗公司、孤立无援，你若碰巧看到他流落街头，可能会想给点零钱，此外竟然没辄。柄谷则相信，共同体将可反抗全球化摧枯拉朽的欺压，他另一部台版《迈向世界共和国》，也简洁呈现了这个理论架构。

经历维基解密、手机串连茉莉花革命等连锁反应，现在读者会问：**共同体是否有机会经由网络形成？**滨野智史《架构的生态系：信息环境被如何设计至今》引用柄谷《隐喻的建筑》引用马克思「一百六十年前的话，把我们现在面对全球信息网的心理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社会的力量并非以个体的凝聚力出现，而是以带着某种疏离感、自外于众人的规范力出现。众人对于这种力量的诞生和趋向，完全无法掌握。因此这种力量不但不受众人掌控，还发展了其独有的一连串情况和转换过程——而这些，并不受人类的期望和行动左右，反而还赋予了人类的这些期望和行动一个方向。」这本书可说从柄谷的共同体理念，来观察留言板、博客、视频网友互动，如何在资本主义疏离孤立环境下，找回共同体的群聚狂欢、情感交融。

如果我是在「内有恶犬」告示下的那条烂狗，每天流着口水死盯铁门底下行人来往脚跟、却咬不到；那么柄谷行人就把我颈上的铁链放长了半公尺，他放了多少人啊。但也不能放过回头反咬柄谷的机会，因为他已正告我们得质疑哲学家的权威，是虚构真理来自抬身价：

「马克思在社会分工过程中发现了哲学与哲学家的起源，指出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开来的那一瞬间，意识成了脱离世界的纯粹理论、哲学、神学等等。尼采说这是僧侣阶级的一种生之颠倒，使不存在的东西优越于现实的东西、并赋予价值，哲学家藏身于真理这一价值中，或因这个价值而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柄谷固然从哲学中建立了自己，但读者得从实践、阅读中不断找机会去验证、推翻，才会更了解柄谷。

译序

「一九六八」在历史上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一个象征；它泛指 1960 年代前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捷克、匈牙利、日本、韩国等地，所发生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与学生运动。

虽然彼此牵连影响，但事实上各国的「一九六八」都有各自的脉络。邻国日本的「一九六八」，其成因、情势都非常复杂，包括源自明治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幸德秋水、大杉荣)、能源政策的转变(三池煤矿)、国家主导的强制开发(成田机场三里冢抗争)与都市计划(东京奥运与大阪万博)、工业与环境问题(水俣病)、新旧左翼知识分子的斗争(各种左派政党的分裂、重组、内斗)、反战(越平连)、阶级问题(部落解放运动)、种族歧视(在日韩国人、朝鲜人、中国人)反殖民(反安保、冲绳返还、美军基地问题)等等；运动形态更是多样化，暴力对抗、和平示威、文化运动、新艺术、公社实验等等，难以枚举。即使是长期研究的学者，也无法骤下简单的定义，更远远超过本书译者的能力。译者在书后添附简略的大事年表，希望让不熟悉日本「一九六八」的读者，可以自行截取一个概略的轮廓。

柄谷行人先生早在一九六〇年就以学生身分，参加第一次的反安保运动。后来他以文学批评家身分活跃于言论界，近年来更成为当代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政治和社会的关心与参与不曾间断，其思想与言论始终深植人类的命运，从未遁入文字与概念的游戏。这本访谈录除了是他第一手的历史观察，也披露他从实践经验中得到的思想；更可以看到一位思想家诞生的轨迹。

今天，台湾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但是整个岛上的人却仍然沉醉在股市的涨跌、艺人的私生活、对中国的幻想与自我欺瞒，对于即将到来的巨变浑浑噩噩。宏观来看，国家是万恶之源；但是莽撞地追求无政府主义，只有让自己委身于更大、更邪恶的国家。那么，我们要依据什么来建立自己的国家？虚构的国族主义吗？排除异己的民主主义吗？我们当然需要行动，但我们更迫切需要一个清醒的言论空间，来面对、厘清我们的未来。

一九六〇年代，台湾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无缘参与「一九六八」狂潮；然而「一九六八」以及它衍生出来的课题，对今日世界的形成、对我们今日的处境，却有很大的影响。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多少引起读者对这个近代史重要时期的关注，进而思考我们的处境。

林暉鈞

第一章 60 年安保斗争与全共斗运动

1 一九六〇年与一九六八年的差异

小岚——到目前为止，关于文学或哲学的议题，柄谷先生接受了多次的访问，也进行过许多对谈。但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体验，就算不是完全没有，您也极少论及。世人一般认为，自从二〇〇一年 NAM¹成立以来，柄谷先生的关心转向政治方面，但我不这样想。我觉得实际上，柄谷先生的言论一向关注政治与实践，而且我认为其渊源可追溯到一九六〇年。

有许多问题想要请教柄谷先生。首先是关于六〇年的安保斗争与七〇年的安保、冲绳斗争，前后这两个运动的同一性，以及它们的差异。第一，六〇年运动的诉求是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重新改订。我们知道柄谷先生曾经参加这个运动；那是个什么样的事件？

接下来，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为了反对佐藤荣作首相访问越南学生们在羽田机场入口的弃天桥，以及高速公路的入口聚集示威；跟着是六八、六九年，通称日大、东大斗争的学生运动；全共斗运动在此时达到顶峰。六九年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学生占据了东大安田讲堂，与政府展开对峙战。但是七〇年以后，运动就急速地衰微了。这个时期，柄谷先生已然是文艺批评界的新秀；当时您怎么观看这些事件？现在，您又怎么看待当时的运动？

柄谷——我一向避免用「世代论」的观点来思考。在我年轻的时候，世代论非常盛行。《太阳的季节》（石原慎太郎着，一九五六；中文版二〇〇四，尖端出版社）、《我们的世代》（大江健三郎着，一九五九）、《然而我们日复一日》（柴田翔着，一九六四）等等，就是以这种观点写作的小说。这里面，有人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感叹「我们」是未老先衰的一代；也有人强调自己和怯懦落伍的上一代不同，主张「我们」是以崭新的感觉与思想，挑战既有秩序的新一代。所以，我告诫自己绝对不要用世代论的观点发表主张。如果我的思想有新意，那必须在普遍意义上

1

¹ NAM 柄谷行人等人，于二〇〇〇年六月成立 NAM(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组织，以 Association 作为对抗国家与资本的运动方式。关于这个运动的意义，在《NAM原理》（二〇〇〇，太田出版社）一书中有详细说明。NAM在规模最大的时候，曾一度拥有七百名会员，于二〇〇三年解散。

是新的;并不会因为自己是年轻一代,思想就会有新的价值。至少,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不过,我并不是要否定世代论,或是否认有「世代」这样的东西存在。只是,举例来说,听到年轻人高谈「我们的世代如何如何」,就觉得滑稽;因为前一个世代的人也讲过同样的话。老年人讲这种话,也一样可笑。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苏美人)遗留下来的文献里,出现过这样的一句话:「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乱七八糟」。这种世代的问题,自古就有。所以,关于世代的议论,如果里面不包含普遍的认识,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在九六〇年进入大学,参加了全学连【注²】的安保斗争,算是所谓的「安保世代」。但是,现在说「安保世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我也不想用这个词。实际上,我一次也没说过。相反地,「全共斗世代」或者「团块世代」这些名词,现在还是有人继续使用。那倒不是因为全共斗世代的人特别喜欢世代论;毕竟「安保世代」的人也曾把世代论挂在嘴边。那么,为什么单单「全共斗世代」或「团块世代」这些词会残留下来呢?我认为,因为那是全世界同时发生的现象。当然,如果是在美国,他们会称之为「the 68ers」、或是「baby boomers」。

不过,我想要强调自己不是「全共斗世代」。当然,我不是要夸大那么些微的年代差异;一九六〇或一九六八,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大概没有什么意义吧。很久以前,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与文学批评教授法兰可·莫瑞提(Franc. More)【注³】谈话;他表示一九六八年的时候,曾经在意大利参加学生运动。他的弟弟南尼·莫瑞提(Nanni Mgem)是意大利电影导演,现在仍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聊到一半,他说:「你我都同样是六〇年代的人啊。」我说,不,我们不太一样。但是,要怎么告诉他,我属于六〇年,而不是六〇年代?这有点难以说明,愈讲愈麻烦,解释到一半,我就放弃了。因为实际上,说我是「六〇年代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对。所以当时我想,算了,就这样说也无所谓吧。在日本也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就象是外国人;跟他们说明六〇年和六八年的差异,没什么意思。所以,我没有太大的动力去谈这件事。

不过,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不一样。举例来说,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一九六八年开始,共产党的权威在左翼学生与知识分子之间急速下降,所以那被视为划时代的一年。但是在日本,这个情况发生于一九六〇年;

六八年的时候,共产党的权威早就一点也不剩。还有,六八年的时候,日本新左翼运动几乎只发生在学生之间,劳工运动和农民运动早已衰退。法国的五月革命并不是这样;他们的新左翼与学生运动,和工会、共产党是并肩共存的。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和日本的「六〇年」相似。当然,七〇年以后,欧洲的新左翼运动也变成和日本同样的处境。

现在谈起「一九六八」,好像当时全世界各地都发生同样的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就算有一些共通的面向,各地的内容是不同的。比方说在美国,旧左翼运动在一九五〇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而消失殆尽。六〇年代中期,以民权运动(黑人解放)与反越战运动为契机,左翼运动再度兴起,也就是美国的新左翼;但那和旧左翼没有关系。不过,即使有这样的差异,的确在一九六八年,欧美和日本都以学生之力「(student power)」为中心,展开了新左翼运动,这一点是共通的。另外,也有像小田实【注在下页】一等人推动的「越平连」(越南和平市民运动连合)那样,和美国的运动直接串联的组织。所以,受到欧美言论的影响,

² 「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连合」,简称「全学连」,成立于一九四八年九月,由全日本国立、公立、私立共一百四十五所大学所组成。首任委员长是武井昭夫,后来成为著名文艺评论家。全学连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甚深,在日本社会运动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³ 莫瑞提 法兰可·莫瑞提(Franc. Moretti)出生于意大利的现代文学研究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一九七二年毕业于罗马大学,获现代文学博士学位。于美国哥伦比亚等大学教授现代文学。创设史丹福小说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Novel)。二〇〇六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代表作有《文学异象》等书。

日本的运动一直以来也被看成是同样的东西。⁴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要把一九六〇年和六八年区隔开来。并不是因为我想夸耀日本的新左翼运动比西洋还要早，六〇年就发生了。日本之所以在一九六〇年发生这样的运动，并不是因为本身有什么独特的理由或原因。走向新左翼的过程里，有一些世界性的共同因素。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注⁵】之后，世人不仅开始批判俄罗斯的斯大林主义，甚至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根本的怀疑。就因为如此，新左翼运动才在世界各地兴起，日本也是其中的一环。

日本，新左翼运动之所以发生得比较早，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日本共产党实在太过差劲。欧洲的共产党有它们各自的传统，并不会对共产国际(苏联)唯命是从。二次大战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共产党是唯一真正进行地下反抗运动的政党；而意大利共产党，则由于受到死于狱中的葛兰西之影响，采取较为柔性的政策。虽然四处兴起对斯大林的批判【注⁶】一开始并没有直接波及各国的共产党。对各国共产党全面性的批判，是从一九六八年才开始的。这一波的风潮，不只批判斯大林主义，更让所谓的「早期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普鲁东谗【注】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重见天日。

关于这一点，日本的情形也是一样；那么为什么偏偏日本的新左翼运动，发生于一九六〇年？这里面包含了以西洋的角度无法理解的问题。换句话说，这里面涵盖了许多日本近代史特有的问题。虽然当时我并没有立刻察觉，但是后来逐渐明白这一点。

比方六〇年安保斗争的时候，我参加了学生运动，不过运动的主体并不是只有学生。到了七〇年，示威队伍里就几乎只剩下学生了。但是六〇年的时候，所有的阶层和世代都参加了运动。实际上，全国总计超过百万人的示威，持续不断好几天。当时工会的力量也很强大。六〇年六月，国铁两度罢工，全国的铁路同时瘫痪。我们必须明白，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

不只如此，知识分子也百花齐放。举例来说，从战前派的清水几太郎、丸山真男、埴谷雄高、竹内好，战中派的吉本隆明、鹤见俊辅，到战后派的江藤淳等等，各式各样的人以各种形态，抱着各自的课题加入。在这个意义上，六〇年可以说是汇集凝结了近代日本所有的问题，我们必须能够以全观的角度来看待它。我认为只从新左翼的观点，无法理解六〇年的安保斗争。新左翼的观点没办法解释日本历史的脉络。

⁴ 小田实(1932-2007)，小说家、评论家、和平运动工作者。留学美国时期旅行世界各地的见闻记录，集结成《凡事都去见识看看吧!》『何でも見てやろう』，一九六一，河出书房新社)，成为畅销书。一九六五年组成「越南和平市民运动连合」，并担任发言人；一直到一九七四年解散之前，与开高健、鹤见俊辅、吉川勇一等人，声援因为反战拒服兵役的美国人等等，持续展开和平运动。代表作品有小说《美国》(一九六二，河出书房新社)、《现代史》上下册(一九六八，讲谈社)、《广岛》(一九八一，讲谈社)以及评论集《难死的思想》(一九六九，文艺春秋社)等书。

⁵ 匈牙利革命 一九五六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匈牙利的劳动者、学生以及知识分子，对于受到苏联支配的党与政府感到不满，在全国各地群起反抗，并组成劳工议会，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但不久苏联军队就接连两次以坦克车队入侵占领，匈牙利民众激烈抵抗，展开全面战斗，结果遭到苏联军队大量屠杀。反抗运动虽然受到镇压而失败，却引起全世界反斯大林主义的风潮，并成为新左翼运动的开端。

⁶ 对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死后，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六年二月的苏维埃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上，发表报告批判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扼杀党内民主、农业政策错误等等罪行。虽然这是为了吸收、抑制党内累积的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的强烈不满，所采取的官僚主义手段，但是却引发苏联政治圈与其他各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托洛茨基的重新评价。

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的新左翼运动是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一种反扑，试图回复西洋的市民社会传统。但是，日本原来并没有那样的传统。毋宁说，一九六〇年日本才首次出现类似市民社会的東西。目睹安保斗争，像丸山真男或是久野收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动地表示，市民社会，或者说是以市民为主体的民主主义，终于在日本生了根。当时我不太了解这个话的意思，还对他们表示轻蔑。现在我想我终于懂了。⁷

西洋没有可以和「六〇年」相提并论的东西，但是韩国有。就在同一年，韩国的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政权，正好与安保斗争重叠在一起。当时日本的学生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我还记得六〇年四月的示威【注⁸】，喊出了「追随韩国学生的脚步！」这样的口号。在我们都还来不及了解韩国之后的情势，六一年就发生了朴正熙的军事叛乱。

一九六〇年对韩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一年的影响，历经一九八一年的光州事件【注⁹】，与九〇年之后的民主化紧紧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六〇年」是这一连串发展的根源。这些过程，仅仅筑基于韩国的历史脉络，和世界性的新左翼发展动向没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下，日本的一九六〇年，是介于西洋与韩国之间的东西。一方面，与出现在欧美的前驱问题有共通之处；另一方面，又面对后进国、或者说是亚洲国家特有的、共有的问题。

以这个观点来看，一九六〇年的安保斗争，有多重解释的方式。举例来说，它可以看成是初期的新左翼运动，或者是市民运动的发端，甚至也可以看成反美的国族运动。

然而，日本的「六八年」就没有这样的多重意义。从这个观点看，它具有世界同时性，可以用日本与西洋共通的问题来理解。回到六〇年，举例来说，一九五五年起，日本的经济开始高度成长，六〇年的安保斗争就发生在这高度成长的正中间。六四年举行了东京奥林匹克。之前日本可说是半个农业国家，但在这期间，日本农业人口的比例急速下降。六〇年之后大学的入学率快速成长，大学生不再是社会的菁英，日本逐渐转变成后工业社会。日本的「六八年」，可说是这一连串变化的结果。

目前，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正经历着我们六〇年代走过的剧烈变化。所以我觉得与其从「六八年」，不如从「六〇年」出发，更能思考，了解世界性规模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下，我算是「六〇年」的人。这个事情很难对现在的年轻人说明清楚，所以我想，或许可以试着以年号的观点来谈。

过去我在论文里(近代日本的论述空间)，收录于《历史与反覆》一书)曾谈过。举例来说，「昭和」这个词具有它自己的意义，是只到昭和三〇年代为止。最近以昭和三〇年代为主题的电影《三丁目的夕阳》很流行。从以前，漫画《乌龙派出所》就让「昭和三〇年代」成为一个很特别的时期。一谈到昭和三〇年代，就会浮现这种日本特有的情境与脉络。但是，说到一九六〇年代，感觉总有些东西变得和全世界共通了。

⁷ 蒲鲁东 (1809- 1865) 法国社会主义者，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⁸ 六〇年四月示威 日本国会通过日美安保条约改订案最为关键的一天，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为数十二万人左右的抗议群众包围乐国会。其中大约一万人，以 Bund 为中心的全学连成员，突破了警察以装甲车、大货车围成的封锁线，冲进国会内部。虽然警察持续以警棍殴打并逮捕群众，国会所在地的霞之关一带不断发生激烈的示威活动。日本全国约有九十所大学的师生罢课，数百个地区展开抗议集会与游行。

⁹ 光州事件透过武装叛乱整肃军中异己，全斗焕掌握了军队的实权，颁布全国戒严令；在野党的领导人相继遭到逮捕，作为反抗据点的大学也遭到封锁。面对这些措施，全罗南道光州市的学生率先以行动对抗，政府投入大量的军队镇压，反而使得众多的劳动者与市民挺身加入抗争。他们用临时构筑的防御工事与原始的武力，和军队对峙，并且进而宣布自治。虽然最后因为军队大规模的屠杀而终告失败，但是光州事件对后来韩国民主化的斗争，产生很大的影响。

昭和三〇年代，以西历来说，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到一九六五年为止。但是，在那之后的时期，一般我们就不再以「昭和四〇年代」来称呼，用一九七〇年代这种讲法感觉熟悉、恰当许多。比方，一九六〇年等于昭和三十一年，这种说法说得通；但是一九六八年，我们就用昭和四十三年来称呼它。可以说，(过了某个时期以后)「昭和」消失了。

在这个意义下，六〇年的日本不但遭遇世界共通的问题，也同时面对如同「昭和」一词蕴涵的、日本固有的问题。话虽如此，从另外的意义来考虑，这个问题也有它的普遍性。可以说我一向对这两方面同时进行思考，而且是有意识地这样做。从上述的观点看，六〇年和六八年的差异意义重大。话虽如此，并不是和我同年代的人都有一样的看法。所以，这和世代论无关，是认知的问题。

2 社会主义与学生同盟的重建

小岚-- 我在一九六四年进入大学就读，虽然和柄谷先生在时间上非常相近，但是这之间的差异，现在我才明白。或许有点突兀，但是我想换一个话题。安保斗争结束后的六〇年到六一年之间，革命共產主义者同盟【注¹⁰】（简称革共同）突然取得运动的主流地位。那个时候，柄谷先生是怎么想的？

柄谷-- 主导一九六〇年学生运动的，是旧 Bund(共產主义者同盟)【注¹¹】。Bund 因为派系纷争，结果在翌年的春天解散。当时我住在东大驹场的宿舍，称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房间，其实就是 Bund 的活动据点。不过，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正式加入 Bund。

Bund 是在一九五八年，由一群从共产党脱党而出的党员结成的组织，所以在各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共产党的延续。要正式加入他们，得通过许多仪式。

但是，六〇年以后那些仪式不复存在。事实上，后来 Bund 和社学同(社会主义学生同盟，一种学生组织)的区别渐渐消失。原本 Bund 以列宁主义式的党(少数精锐的前卫党)自许，但是在安保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演变成学生运动的组织。不过，我倒觉得这样比较好。比我稍微年长的人，比如西部迈【注¹²】等人，他们参加过共产党，但是我没有那种经验。不过，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没有参与 Bund 的经验。

同样的情势，六八年以后又再度发生。六〇年代后半的新左翼运动，是由通称「三派」的 Bund、中核派、解放派发起的，他们原本都是以重建列宁主义式的前卫党为目标。但是一旦运动热烈起来，那种东西就变得无所谓了。从现实的运动中，诞生了「全共斗」这个组织。全共斗采取了一种议会(英文: Council, 俄文: sovi er, 德文: Rar) 的型态，但是，他们是自发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人提案才这么做。

¹⁰ 革命共產主义者同盟 在日本的斯大林批判潮流中，「革命共產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于一九五九年成立，宣称脱离托洛斯基教条主义，以反帝国主义、反斯大林主义之世界革命为宗旨。六〇年安保全学连之中，还不是主流；当时的主流是「共產主义者同盟」(Bund)。之后 Bund 的成员大多数转移到「革共同」旗下。六三年因为对党的实践改革(地区党的建设、劳动运动路线、反战斗争、革命议会主义、统一战线等议题)产生意见分歧，分裂成「革共同全国委员会」(通称中核派，以本多延嘉、清水丈夫等人为首)与「革共同革命马克思派」(以黑田宽、松崎明等人为首)。

¹¹ Bund 以日本共产党之中，中央反对派的末端学生组织为首，一九五八年组成「共產主义者同盟」，简称 Bund(第一次 Bund, 或称旧 Bund)，宣告日本新左翼运动的发展以及新政党的可能性。六〇年担任推手，将安保斗争带至高潮；但是随着安保斗争的失败分裂成三派，终至离开运动而解体。其后于六六年再度集结，称为第二次 Bund

¹² 西部迈(Ni shi besusumu, 1939-)，经济学家、评论家。曾任东京大学教授，秀明大学校长。一九六〇年安保斗争时期担任东大驹场自治会委员长、全学连 副委员长。以擅长演说知名。

举例来说，日大斗争【注¹³】的时候，虽然也有一些人本来就是参加过党派的运动者，但那是极端的少数。当时我住的地方距离日大文理学部很近，经常去看他们的活动。开始的时候学生们只是聚在一起唱唱歌，而且还是校歌之类的歌曲，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像「国际歌」这种东西。只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就成长为巨大的运动团体。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群众的自然成长性」吧。

汉娜·鄂兰【注¹⁴】在六八年的时候曾发表言论表示，议会这种东西自古代氏族社会开始就已经存在，并不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而设计出来的，就算没有人教导，也会自然实现。但倒过来说，并不是只要有人教导，就一定会实现。

六〇年 Bund 分裂【注¹⁵】成三派彼此论争。有趣的是，这三派各自代表了马克思的三个思想要素，也就是哲学(德国)、经济学(英国)、组织论(法国)。处在这场论争的夹缝中，驹场的团体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我认为从这三派里面，不管选择那一个都不对。Bund 解散后的一九六一年五月，我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社学同)的构想，并且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我的诉求：首先，在驹场重建社学同，然后以之为基础，推动全国性社学同的重建。当时我主张社学同的重建，不应该以 Bund 那样的前卫党为目标；我的构想，事实上是类似后来「全共斗」那样的组织。

小岚-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不具名的学生，但是它在与运动有关的一群人之间，是一篇有名的论文呢(笑)。

柄谷- 其实我自己从来没有回过头去重读那篇文章，也没有兴趣再去读它。不过，前一阵子我遇到经秀实【注¹⁶】，他说那篇论文和我「现在的文体完全一样」(笑)。那年(一九六一)的秋天，全国社学同成立，不过就在那个时候我退出了。

小岚- 退出的理由或原因是什么？

柄谷- 因为感受到各式各样的矛盾。关于社学同的重建，本来我只考虑到学生的立场。但是，学生以外的人该如何？出了学校以后怎么办？继续从事运动吗？还是什么都不做，让群众运动自然发生？这些都是问题。这些事情，虽然一开始就知道了，但是在重建社学同的当时，我选择不去想它。

作为一个个人，如果决定一直从事运动，该怎么做？这本来就是个问题。运动风潮高昂的时候还好，但是一旦运动衰退，运动工作者如果还要坚持下去，就需要严谨的组织。因此，六〇年 Bund 的干部大部分转移阵营，加入了革共同(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之所以解散，可以说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们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¹³ 日大斗争一九六八年五月·日本大学二十二亿日元资金去向不明事件曝光，学生群起抗议，所有科系集结，以秋田明大为议长，组成全学共斗会议；在校内筑起防御工事，与体育会学生、校警、警方的机动部队展开激烈战斗，实质上占领了大学校园。学生集体弹劾日大理事长古田重二良等人，获得胜利，引起佐藤政权的政治介入，警察机动队大量进入校园，并进而引发东大斗争。日大斗争可以说是推动日本全国的全共斗运动最大的推手，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¹⁴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 1906- 1975) (也就是阿伦特)，师事海德格、雅斯培之政治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因为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先流亡至法国，尔后前往美国。一九五一年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研究并批判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¹⁵ Bund 的分裂 Bund 分裂为三派：无产阶级通信派(以清水丈夫、青木昌彦等人之全学连书记局为中心)、革命通达派(以长崎浩等东大学生组织为基础)，以及战旗派(以陶山健一等人的机关报编辑部与劳对派为主轴)。关西的 Bund 没有分裂，称为关西 Bund。

¹⁶ 经秀实(Suga Hidemi- 1949-)，出身新潟县的文艺评论家，近畿大学教授。曾出版大量的文学评论，但近年来以关于六〇年代思想史的著作受到注目。特别是《吉本隆明的时代》(二〇〇八，作品社)一书，对于一九六〇年前后的情势与状况有详尽的观察与描述。

革共同原本只是黑田宽一的读书会而已，安保斗争的时期是 Bund 的追随者。虽然抱持「前卫党」的理论，但是理论多于实践，行动力不足，学生运动家一个也没有。所以，解散 Bund，转移过来的那些人，立刻就成为革共同的中心。但是，从革共同旧有成员的角度来看，这些新来的家伙都是些个性冲动的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者。结果由于他们的加入，革共同很快就分裂了（分裂成中核派和革命马克思派）。虽然我彻底反对这些家伙的想法，但是，那又该怎么做才好呢？当时我也不知道。

社学同也是一样，很快的被以关西 Bund 为中心的 Bund 重建派取得主导权。事实上，这个团体在六〇年代后半组成了政党。话虽如此，Bund 系的人在本质上的某些地方，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所以，全共斗的中心，大体上也都是 Bund 的人在主导。相反地，那些把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体质，视为小资产阶级产物的家伙们，过度自我否定的结果，最后演变成了连合赤军【注¹⁷】

小岚- - 柄谷先生退出社学同之后，是不是就走上了文学的路？

柄谷- - 是的。总之，当时如果想要一直继续从事运动，大概只有三条可能的路：组成政党；留在大学里从事学术研究；还有就是文学。作为职业，当编辑也是一种可能。但是，任何一条路都不好走。想留在大学里，就得好好念书；想从事文学的话，需要才能。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

我对于重建之后的社学同很快就感到厌烦，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化倾向，反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气质」。当然，那是半吊子的文学，和真正的文学是无缘的。就像世人形容为具有「诗意」的东西，和诗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文学并不是「文学气质」。文学同时需要才能和劳动；有了才能，还需要勤勉踏实的工作。

关于运动，我认同无政府主义；但是我却没办法喜欢一般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几乎都只是一些三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如果要从事文学，就非得全心全意，从根本做起不可；和政治活动一样，需要很大的决心。想用半吊子的态度兼顾「政治和文学」，那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九七〇年，全共斗运动衰退之后。可能走的路，仍然只有三个选择：加入政治组织（党）、做学术研究，或者从事文学工作。当然，如果选择一般的工作，还可以找到某种方式来参与革命运动的话，就很理想，但事实上那非常困难。

实际上，全共斗衰退之后，参与运动的人分化成许多党派。至于不愿加入党派的人，大部分不是留在大学里，就是开始工作。那个时候选择从事文学的人很多。换句话说，现实上做不到的事，试图藉著文学，在想象力之中追求。这在法国等地也是一样。法国的「现代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六八年五月革命【注¹⁸】，的挫折之后，在文学里寻找出路。虽然称之为哲学，事实上是比较接近文学的东西。

¹⁷ 连合赤军第二次 Bund 在七〇到七一年间瓦解，其中赤军派的一部分，与京滨安保共斗（日本共产党革命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结合，于七一年组成统一赤军；之后改名为连合赤军他们在山里面建立根据地，并且进行称为「总括」的组织内清算与集体私刑。七二年二月，一部分持有枪械的成员占领长野县轻井泽的浅间山庄，多次开枪射击，最后遭到警方成功制伏。这个事件一般称为「连合赤军事件」，不仅对日本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特别是集体私刑的部分，使得民众对新左翼运动感到莫大的失望。

¹⁸ 六八年五月革命 六六年由史特拉斯堡(srra, sbourg) 大学发端与南泰尔(Namerre)、索邦(sorbon- ne)等大学发起全法国的学生运动，提出大学民主化、学生自治等诉求；后来并加入了反越战的议题，与劳动者结盟。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劳动者、学生共同发动了一千万人的总罢课，总罢工，战斗的示威活动延烧至法国全境。陷入绝境的戴高乐总统出动军队镇压，但同时也接受学生们的部分要求，解散国会、重新选举、改变教育政策。这个运动的余波影响了全世界。

但是对于一九七〇年的这个潮流，我有不太一样的感受。虽然基本上是相同的(和一九六〇年相比)，只不过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六八年到七〇年之间发生的事，某种意义上，是六〇年代初期的反覆。对于全共斗世代的人来说，也许是新的经验，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第二次了。在六一年的阶段，我没有找到任何解决的方式，但至少我已经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七〇年代，我的反应有了相当大的不同。

小岚- 关于这一点，还希望您多说一些。

柄谷- 举例来说，七〇年代的新左翼之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甚至还出现了像「马克思送葬派」【注¹⁹】这样的东西。这是来自法国毛泽东派的残羹剩饭，所谓「新哲学家」【注²⁰】的影响。日本六〇年代的毛泽东主义本身，也是经由法国间接传入的。但是，我只觉得他们愚蠢至极。

说到这个，我本来就觉得六〇年代的毛泽东主义很愚蠢。一九五〇年代，受到中国革命感染，日本成立了类似山中游击队的组织，称为山村工作队【注²¹】。当时的共产党(主流派)分不清日本农村与中国农村的差别，当然不可能成功；因此受到挫折而改变信念的人很多。现在要是把那时参加过山村工作队的人，名字一一列出来，大家都要吓一跳。

既然知道这些事，六〇年代后半竟然还有人崇拜毛泽东，真是令我目瞪口呆。有人信奉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出政权」【注²²】，赞美枪击战；其现实上的结果就是「浅间山庄事件」【注²³】。另外，也有透过法国间接传入的毛泽东主义(Maoism)；托洛斯基主义者谗【注²⁴】颂扬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永久革命」；与此同时，法国还有一些家伙以为他们在毛泽东身上找到超越西洋近代的思想。不用说，进入七〇年代以后，这些家伙就改变了立场，自称「新哲学家」，开始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结束了什么的。

但是，这些说法一点都不新奇。六〇年代就有过这种「马克思主义结束了」的大合唱。举例来说，清水几太郎虽然在六〇年安保运动时，与全学连共同奋斗过，却在翌年(六一年)开始全面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这句话曾经流行一时。在经济学方面，从宇野学派【下页注】转向近代经济学的人不在少数，青木昌彦和西部迈就是如此。我曾经是经济学系的学生，如果当时继续念经济学，说不定也会走上同样的路；但是因为我中止了经济学，转往文学，反而有机会重新思考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

¹⁹ 马克思送葬派 小阪修平、笠井洁、户田彻等人，在杂志《第三文明》七九年十二月号的座谈会上，对共产党与新左翼提出总检讨，并且针对马克思主义，说出「为马克思送终」一语，因而被称呼为「马克思送葬派」。

²⁰ (Nouveaux Philosophes) 亦称为「新哲学派」，以格吕克斯曼(1937-)与列维 (Bernard-Henri Lévy, 1948-) 为旗手。一九六八年他们以毛泽东主义者的立场参加了五月革命。之后他们从右翼的观点批判法国社会党，二〇〇七年支持沙克吉 (Nicolas Sarkozy) 政权，都为他们惹来争议。格吕克斯曼著有《战争论》《第十一诫》等书，列维则著有《沙特的世纪》等书。

²¹ 山村工作队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时期，日本共产党一方面受到镇压，另一方面因为路线之争，分裂为「所感派」(主流派，以德田球一人为首)及「国际派」(以宫本显治人为首)。所感派在五一年十月第五次全国协议会上，通过五一年纲领，决定以军事为方针，并以此为基础，组织山村工作队与中核自卫队。山村工作队的作为完偏离现实的劳工、农民运动。

²² 杆子出政权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针对前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失败进行总检讨毛泽东的发言。这句话后来成为中共进行斗争的重要行动口号。

²³ 「浅间山庄事件」 见注 16「连合赤军」条

²⁴ 托洛斯基主义 托洛斯基(1879-1940)是乌克兰出身的苏俄政治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斯大林掌权时期遭到苏联共产党除名、流放。托洛斯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称为「托洛斯基主义」(Trotskyism)，但是所谓「托洛斯基主义者」(Trotskyism)却不一定和托洛斯基主义有关。过去在共产主义圈之中，凡是服从各国共产党令的共产主义者，不论其信仰是否受托洛斯基影响，一律被称为托洛斯基主义者，因而成为「反叛者」的代名词，带有强烈的贬意。

²⁵而言之，一九六〇年之后，马克思主义运动曾经一度死灭。过了那个时期，我再度回到马克思；也许应该说，从那之后我才第一次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举例来说，七四年我在文艺杂志《群像》连载〈马克思，其可能性之中心〉【注²⁶】，当时在读者之间出现了「这种时候，为什么还在搞马克思？」这样的反应。但是，六〇年代前半也出现过同样的风潮。我开始思考马克思的时候，正是那些愚蠢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看不起马克思主义的时代。

²⁵ 宇野学派 以宇野弘藏(1897- 1977)为中心，加上铃木鸿一郎(1910- 83)、大内力(1918- 2009)等人，以各自的观点，建立了马克思经济学之独特体系(宇野经济学)，故被称为「宇野学派」。后继的知名学者还有降旗节雄(1930, 2009)、鎌仓孝夫(1934-)、山口重克(1932-)、马场宏二(1933-)、伊藤诚(1936-)等等。有人认为，虽然为数众多的后进研究者试图更进一步发展宇野经济学，但反而造成宇野学派之解体。

宇野经济学的重要特征，是将经济学研究分为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之「三阶段论」，其理论骨干可分为五点：(1)科学与意识形态之区别；(2)纯粹资本主义与其三大经济法则(价值法则、人口法则、利润均等化法则)之逻辑体系；(3)帝国主义论之重新建构；(4)世界经济论之现状分析；(5)理论与实践、科学研究与政治行动之区别与关联。

宇野学派之重要文献有《宇野弘藏著作集》全十一卷(一九七三~七四，岩波书店)、《经济学体系》全八卷(一九六二~六五，东京大学出版会)、《资本论研究》全五卷(一九六七~六八，筑摩书房)、《帝国主义研究讲座》全五卷(一九七二~七九，青木书店)等等

²⁶ 〈马克思，其可能性之中心〉(有中译版) 一九七四年连载于《群像》杂志，七八年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九〇年编入讲谈社学术文库。在高唱「马克思的终结」之时代潮流中，作者主张「我们终于进入能够阅读马克思的时代」，明白指出马克思的可能性之中心，以价值形态论为起点，对于我们应该如何阅读马克思，作了先驱性的提示。本书为思想界开拓了新的地平线，是划时代的重要著作。

3 安保斗争以来的观察

小岚- 您对「国家」、「国族」(Nation)、「资本」的深刻思考,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吗

柄谷- 并不尽然。虽然我相当深入地思考资本主义的问题,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对国家与国族的了解,几乎等于是空白的。当然,我一直很在意这两个问题;因为不只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一直在国家和国族的问题上受挫。天皇制的问题也是其中之一。

原本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把国家和国族,看成是由下层结构(经济)所决定的上层结构。但是在法西斯主义诞生之后,这个说法没有能力解释所发生的现象,所以大家开始讨论上层结构的「相对自律性」。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将精神分析导入他们的理论;在日本则有丸山真男注²⁷引进了社会学的观点;吉本隆明【注²⁷】更提出了「共同幻想论」的思想。另外,安德森【注²⁸】以「想象的共同体」之观点来思考国族。但是这些尝试并没有在根本观念上提出真正的改变,它们仍然将国家和国族视为一种「意识型态式的」上层结构。

但是,观察明治以来日本的经验就可以明了,不论国家或国族,都是具有主动能力的主体。事实上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国家主导、人为「做出来」的东西。这一点只要看「日本制铁」就可以明白- -这家公司一开始是由国家创立,后来才转为民营。仔细思考这些经验我们将发现,把国家和国族单单看成是表象或是上层结构的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如果是幻想或表象,一定可以透过启蒙来破除。但是国家和国族不只是幻想或表象,它本身建立在特定的(经济的)交换模式之上;就像资本扎根在商品交换模式一样。

小岚- 柄谷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关心,和六〇年的安保斗争有关吗?安保斗争直接面对的,就是「国家」这个政治问题。

柄谷- 是这样没错。我之所以经常思考国家和国族的问题,的确是和六〇年的问题有关。六〇年安保,抗争的重点在于条约的改订;这个条约将决定日本和西洋、亚洲各国之间,国与国的关系。因此,安保斗争可以明确地分出胜负成败。如果不能阻止新约的改订,那就是失败了。

但是六八年就没办法清楚判别运动的成败。虽然有反越战的诉求,但是日本并没有以国家的身分参战,只是大家在日本国内提倡反越战而已。「解散大学」这个主张,并没有胜负可言;本来就算弄垮一个接一个的大学,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反过来看,可以说从这里诞生了新的运动。就算只是封锁了小小的大学,这个举动却直接和世界联结在一起,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世界;因为个体和整体产生了相互呼应的关系。

还有,在这之前的运动,重视的是阶级斗争,性别或是弱势族群等等问题,被认为是次要的,放在第二线。但是六八年这个想法改变了。另外,对于像「国家」这种宏观政治与权力之重视,也转移到微权力,或是微观政治(microPOBCS)的领域。这些现象都发生在六八年之后。我认为这些转变很重要。只不过,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宏观的次元,国家和国族的次元,被过度地简化了。

²⁷ 吉本隆明 吉本隆明(1924-),诗人、文艺批评家。六〇年安保斗争时期,曾与全学连共同抗争。之后出版了《虚构的终结》(一九六二,现代思潮社)一书,对安保斗争进行总检讨,提倡「独立的思想」。代表作另有《共同幻想论》(一九六八,河出书房新社)、《「向情况发言」全集》全三册(二〇〇八,洋泉社)等。

²⁸ 安德森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出身爱尔兰,西欧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代表人物、比较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以独特的概念探究国族主义(Nationalism)与国族(Nation)的形成,译成多国语言,公认为是开创国族主义研究里程碑的重要作品。

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傅柯【注²⁹】比起阿图塞【注³⁰】的影响，傅柯的思想在根本上，有更多来自葛兰姆西「霸权」(Hegemony) 的观念。在他的想法里，国家不只是一种暴力装置，同时也是意识型态的装置，并从这个角度深入思考。在这个意义下，傅柯和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认为国家不只透过暴力的独占来掌握权力，并且经由各式各样的意识型态教育装置来实行统治的机能。对他来说，权力这种力量(Hegemony)，其基础毋宁说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所以，他强调非聚集于中心的、散在的、看不见的微权力。换句话说，比起宏观的政治学，他更强调微观的政治学。

我认为这个思考方向很好。当政治斗争的着力点，从阶级斗争转向女性主义、同性恋以及其他弱势团体问题的时候，这种看法起了很大的帮助；但同时，这个看法会扭曲我们对「国家」的观察。(傅柯和)葛兰姆西都没有看到，国家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存在的。国家是因为某个共同体持续地支配其他的共同体才得以成立。不论是共同体扩大之后转化成国家，或者是共同体的内部产生阶级对立之后形成国家，这些解释都是行不通的。

傅柯谈论了无形的微权力，但是无形的并非只有微权力；「国家」这个巨形的权力，我们也同样看不到。不管怎么做，我们总是从国家内部来思考「国家」；这样做是看不到「国家」的。

举例来说，在日本我们常常说「美国是这样想的」这种话；但是，如果你去问美国人，他们会说，那只是布什政权的想法。同样地，如果外国人说「日本这样主张」，我们会感到反感：「这个话到底是谁、在什么场合说的？」就在最近，在澳洲等国家有许多人批判日本决定持续并且扩大捕杀鲸鱼；但是我不知道这在日本是什么时候决定的。不管问谁，都没有人知道。尽管如此，总之看来日本这个国家的确有这样的政策。外于政党、政客的意见，国家有它自己的意志。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是具有意志的主体；这件事如果不从外面看，是不能了解的国与国，互相都是如此。如果只从内部思考，就看不到「国家的意志」这种东西。举例来说，一般的法国人普遍认为日本的一切都由国家官僚来执行，而在法国就不一样。但是，会这样想的，只有法国人而已(笑)。从外面看的话，像法国那样，官僚化到这种程度的国家少之又少。比方雷诺汽车，事实上差不多可以说是国营的。实际上，一直到前不久，它的确是国营的。知识分子也一样。比方说 *Ecole Normale* (法兰西国立高等师范学校) 的学生，与其说他们是学生，还不如说是领薪水的官吏。傅柯就毕业于这所学校，但是他对于自己是官僚出身一事，毫无自觉。如果你在法国里面，你就看不到法国这个「国家」，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顺带一提，我认为像纳格利一【注³¹】这些「六八年」型的人，欠缺对「国家论」的基本常识，只知道从国家内部来思考国家的问题。他们不认识「国家因为相对于其他的国家而存在」这个观念，所以把「否定国家」这件事看得太过简单。

小岚- 关于六〇年安保与七〇年安保，其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我知道柄谷先生的观点了。您对于「国家」的看法，我也了解了。

柄谷- 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观点(微观与宏观)有优劣之分，我只是说有这两种观点存在。举例来说在日本，一九九〇年以降，特别是波斯湾战争之后，「国家」突然暴露在我们眼前。经过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国家」的存在更为清楚明显。不过，「国家」并不是真的突然出现；只是我们一直忽视它的存在，所以看起来很突然。

²⁹ 傅柯(Mich Foucault 1926- 84)，法国哲学家、后结构主义者。一般认为纳格利亦曾受他的影响。代表作有《监狱的诞生》(1975) 等书。

³⁰ 阿图塞 阿图塞(Louis Althusser 1918- 90)，提倡结构主义之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九六五出版《献给马克思》，一九六五~九六出版《阅读资本论》等书

³¹ (奈格里) 纳格利(1933-)，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政治活动家、哲学家。与哈德(哈特)合著《帝国--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与 Multitude 之可能性》，主张一种新的主权形态，认为在全球化主义之中，将会产生「以单一的支配逻辑为基础，统合多数国家的超国家组织」。

小嵐- - 还有，想请您谈一下党派斗争，也就是俗称「内 **Gewak**」【译注³²】的问题。

柄谷- - 「内 **Gewalt**」的发生，是因为企图用暴力来解决意见的纷争。可是我认为，你可以杀死一个人，但你杀死不了他的意见。换句话说，想用暴力来杀死思想，是不可能的。杀人者最终必将灭亡。记得在一九七一年左右，新左翼发生第一次暴力内斗杀人事件的时候，我在《日本读书新闻》的时事评论中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到今天我的想法还是没变。

³² **Gewalt** 来自德文，原意是威力、暴力，在日本一般指称针对国家权力的实力斗争，特别是用在学生运动。「内 **Gewalt**」则是指组织内部的暴力内斗。

第二章 思想家之路

1 六〇年代

小岚- 我们拜听了柄谷先生一九六〇年的政治体验。接下来，想请您谈谈一九六〇年代、七〇年代、八〇年代、九〇年代，一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您工作的历程；每一个时代工作的课题和重点。首先，我们知道您在大学专攻的是经济学，这和您参加「Bund」运动有关吗？

柄谷- 「Bund」的成员里，从青木昌彦【注³³】直到西部迈，的确有很多经济学系的学生。不过我之所以进入经济学系就读，和这个没有关系。我认真研读经济学- 正确地说，是宇野弘藏³⁴的著作- 是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注³⁴】。真的进入位于东大本乡校区的经济学系之后，就没有再读了。当时虽然宇野弘藏已经退休，经济学系里还是有很多宇野派的教授，但是因为我对经济学没什么兴趣，所以都没去上课。那时我已经决心要从事文学工作。换句话说，我进入经济学系，和运动没有关系；只是因进不了文学系，只好选了经济学系而已。

我进东京大学的时候，选的是文科一类。当时文科也好，理科也好，都只各分为两类。（到了三年级）文科一类可以选择就读法学系或是经济学系。我对法学系一点兴趣都没有。其实我本来想念理科一类，在入学考之前，才临时改变志愿，选了文科。当时文科和理科的考试科目一样，所以这种转换是可能的。我很想研究数学，同时又想从事文学；但是当时我觉得这两者都需要天才，自己大概做不到，所以试着寻找同时可以满足我对数学与文学之兴趣的学科。我以为经济学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这个想法完全错了。

事实上，我读过一些数理经济学；因为我相信如果马克思生活在当代，一定会往这方面研究。但是经济学使用的是很低阶的数学，很快就令我厌烦。没想到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另一方面，经济学只从单一的观点来观察人类，层次和文学相差太远。

结果，我决定就算没有天分，也要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学。在文学的范围里，我选择了批评。如果是文学批评，应该就可以碰触任何题材吧。我可以思考《资本论》；哲学也好，数学也好，都可以作为思考的对象。事实上，我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处理了数学基础论的问题。（《作为隐喻的建筑》[『隠喩としての建筑』]，一九七九，冬树社；一九八九，讲谈社学术文库；二〇〇四定本，柄谷行人集2，岩波书店）

小岚- 决定进入经济学系的契机是什么呢？

柄谷- 说到为什么就读经济学系，是因为当时从事文学的决心还不够坚定。文科一类想要进法学系的学生，为了提高成绩大家拼命念书。我因为打算去经济学系，完全不管学校的课业，所以不管想转什么系都转不成。不过那时我想，就念经济学系也无所谓吧。想从事文学，也不一定非念文学系不可。

³³ 青木昌彦(1938-)经济学者，比较制度分析专家·史丹佛大学名誉教授。一九六〇年当时，以 Bund 之理论家(笔名姬冈玲治)著名。

³⁴ 东大学制 东京大学的学制，前两年是基础课程，第三年开始才分专业学系。

话虽如此，偶尔我会参加法国文学或是哲学的研讨会。另外也在 **Arh6n6e Français**【译注：日本著名的外语教学机构】上课。不过，我没有出席经济学的课，因为每年教的东西都一样。经济学系的考试和上课的出席率没有关系。每年举行一次，如果你今年没参加，明年还可以去考；讲课的内容每年都一样。既然如此，只要自己看书就可以了。

只不过为了毕业，必须通过考试，因此我还是好好念了书。那时候念的东西，到现在对我都还很有帮助。举例来说，其中之一是铃木鸿一郎教授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以合乎逻辑的方式，重新建构《资本论》，将它整理成三个过程：流通过程、生产过程以及信用过程，刚好和《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相对应。考试的试题，每年从这三部分中选出一部分来考。有的人会赌运气，只挑其中一部分来准备，如果没有猜中，那就第二年再应考。但是我细读了全部三部分，把整个体系背了起来。

那时候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信用过程。以《资本论》来说，是第三卷。本来第三卷是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整理他的笔记编纂而成的，很不容易理解。虽然我也读了宇野弘藏，但是透过铃木鸿一郎的《经济学原理》，我才第一次理解《资本论》作为思想体系的性质。

通常谈到《资本论》，大多数人只读第一卷和第二卷。卢卡其【注³⁵】也好，阿图塞也好，都没有读第三卷。至少他们没有精读，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我本来也是这样。但是为了考试精读全部三卷之后，我才初次了解到《资本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三卷讨论的是信用过程。如果只读第一卷和第二卷，就不会知道《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是一种「信用的体系」。平常大家读了第一卷，认为资本就是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以为这就是资本主义，马克思所写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但如果是这种程度的东西，在马克思之前的李嘉图左派译注³⁶就已经写过了。「榨取」、「支薪奴隶」等等，都是他们用过的语汇。马克思独到之处，不在这种地方。

小岚- 那么，马克思的独特性在哪里？

柄谷- 马克思试图掌握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貌。从早期开始，他就尝试援用宗教批判的方法来批判货币，或是资本制经济，并且以《资本论》来完成这个课题。这和历史唯物论的公式没有关系。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是下层结构(地基)，政治、意识形态则是搭建于其上的上层结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从商品交换这个下层结构所形成的，一种具有类似宗教性质的上层结构。

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信用的体系，所以「信用恐慌」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非得建立在信用之上呢？因为现实上「交换」的运作不是件容易的事。举例来说，如果在某件商品实际卖出之前，我们只能等待的话，那么下一波的生产就没有办法继续。所以，(有了买卖的约定之后)我们就当作它已经卖掉了，继续下一阶段的生产。这时候，我们使用合约、支票等等字据，这就是「信用」。

³⁵ 卢卡其(1885- 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运动家、哲学家，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之一《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九二二)以独具的观点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压制，为后来的思想潮流带来许多影响。但是在斯大林专制支配时期，他巧妙地避开政治摩擦的身段，也为他招致批评

³⁶ 李嘉图左派 或称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其经济思想以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为基础；他们认为自由市场是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但租金、利润与利息并非自由市场的自然产物；他们主张「交换价值」是由劳动者所创造，应该归于劳动者。有趣的是，李嘉图(1772- 1823)本人并非社会主义者。出身于英国，他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与亚当斯密并列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奠基者；本身亦擅于经商投资，累积了不少财富。

有了「信用」作根据，交换的频率和规模就可以扩大。所以说资本主义经济从根本上以信用为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就是由无数的信用关系交织而成的网络所构成，一旦出现破绽，系统的运转就会停滞而摇摇欲坠，这就是「经济危机」(恐慌)。因为以信用为基础的虚拟世界毁坏了。不过，资本主义并不会因此而真的瓦解，只是会造成不景气而已。在不景气的期间，体质不良的企业会被淘汰，然后景气又会慢慢地恢复。对资本主义来说，这种「景气循环」是无可避免的。

为了应付考试，我特别精读了「信用过程」，才首次理解了《资本论》的体系。

小岚- 那么，您没有想过继续研究经济学吗？

柄谷- 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要从事文学工作了，所以研究所的考试放弃了经济学系，参加了英文系的考试。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读了《资本论》之后，觉得资本主义简直就是宗教的世界。如果我的志向是成为经济学家，大概就不会有这种感想了。认为经济并不是什么坚固的下层结构，而是由信用、信仰所构成的世界，还觉得这样的现象很有趣，足以证明我不适合成为经济学家。

刚才我说自己进了经济学系以后，就没有再读宇野弘藏的书了。不过，宇野有几个论点，我一直记在脑海里；离开经济学系之后，也一直在思考。

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恐慌会造成资本主义的崩坏，并且为社会主义的到来铺路，但是宇野弘藏不这么想。宇野认为《资本论》里所谈到的，是恐慌的必然性；但那并不等同于革命的必然性，或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资本主义以「劳动力商品」这种特殊的商品为基础，所以恐慌与不景气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宇野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伦理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是实践的(伦理的)问题」这个想法，我受到宇野很深的影响，它是我不断思考的课题。我认为宇野的这个想法，与其说是来自马克思，不如说是来自康德。不过等我发现这一点，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要等到一九九〇年，我开始撰写《超越的批判- 康德与马克思》的时候。

顺带一提，当时研读宇野的人，并不是只有「Bund」等等新左翼人士。虽然现在大家都忘了，当时在东大，宇野的《经济原论》不但是经济学系，也是法学系学生的必修科目。没拿到这个学分，就不能毕业。是左翼也好，不是左翼也好，大家都读过宇野的书。很多人学了宇野的理论，进入政府单位或大企业工作。当然，对于这一类的选择，宇野并不予以责难。因为不论怎么做，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宇野说过，你们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要记住这一点：资本主义有它根本的弱点，经济恐慌是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那些学过宇野经济学的官僚和企业干部是如何活用他们的所学，但是他们应该是比那些市场经济万能论训练出来的人要来得好一些吧。虽然每次发生类似最近的经济恐慌，就会有人慌慌张张，以为资本主义就要结束而骚动起来，但是资本主义是不会自动终止的。不管必须做什么，国家和资本都会想办法让自己的存在延续下去。

2 走上文学批评之路

小岚- 研究所您选了英语文学科，为什么？

柄谷- 我读过不少法国文学，也在 Arhen s' Fran9afs 学法文。但是考研究所的时候，之所以没有选择法国文学科，是因为听说申请法国文学研究所，需要提出大学毕业论文。也就是说，我必须从大学部重新读起。英文科则不需要审查论文，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了。所以我申请了英文科的研究所。不过话虽如此，其实我对于法国文学或多或少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反感。日本的文学批评自小林秀雄以来，大家都经过法国文学的训练；要不然，就是德国哲学。不管是哪一边，都让我有墨守成、僵化的感觉。相对于法国文学与德国哲学，英语文学一直受到轻视，但是让我觉得有趣的人，多半是英语文学系统出身的，比方夏目漱石就是。

那时我打算从事写作，完全没想过要当大学的老师。进了英文研究所也一样，没想过要专攻英语文学。我只是想，如果进研究所，暂时就可以无所事事，闲晃一阵子，总比留在大学部，当留级生好吧。同时，也不想让父母太过操心。没想到，虽然我本来没有任何期待，但是英文科的学生拿到硕士学位之后，立刻就可以取得专任的教职。当然，是担任语文教师。知道了这一点，我就赶紧在两年完成课程所需、拿到学位，变成英语老师。

为了尽快毕业，我的硕士论文题目选了杜雷尔(Lawrence Durrell)【注³⁷】的《亚历山卓四部曲》。因为几乎没有可用的参考文献，我援引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来作分析。那个时代，念英语文学却可以阅读黑格尔的人，几乎没有；即使在英美也是一样。在大桥健三郎教授(我的论文评审之一)的建议之下，我将那篇论文改写成日文，发表在杂志上。硕士论文就立刻可以发表、领取稿酬，这种例子应该不多吧。其实，当时如果我有意愿的话，应该也可以用英文出版；但是我对英语文学领域一点野心也没有。虽然变成英语教师，但因为教的不是英语「文学」，所以工作很轻松，不备课也没关系，我可以把精力放在写作上。结果，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十年左右。

小岚- 一九六九年，您以〈漱石论〉一文，得到评论部门的「群像新人赏」。

柄谷- 是的。在那之后的数年间，我以文学批评家的身分活动。那个时期，正好古井由吉、后藤明生、黑井千次等等作家，所谓「内向的世代」注³⁸」出现在文坛；我曾经为文支持他们，为他们辩护。虽然有人批评这些「内向的」作家不关心政治，但是我认为「内向」并不等于「非政治」。那时候我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一次都不曾深刻地向内探索，那就没办法真正朝向外面，面对世界。

那个时期，刚好是全共斗的时代，但是我完全不曾写过迎合他们的文章；毋宁说对于他们，我的写作一直带着批判色彩。事实上，我曾在日本医科大学，与其他的讲师和助教一共四人，因为拒绝授课而辞职，可以说是所谓的「造反教员」。但是文学和这种反抗行为，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只因为主题的倾向，就算作左翼文学，这种文学我无法认同。因为如此，我以为在全共斗活跃的那些人，大概不会读我的文章吧。后来才听说，我的读者好像还满多的，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而已。

³⁷ 杜雷尔 (1912- 90)，出生于印度，来自爱尔兰家庭的英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亚历山卓四部曲》(The Alexandria 1957- 60) 等。

³⁸ 「内向的世代」 「内向的世代」指的是日本文学史上，出生于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左右，活跃于昭和四十年代的作家。七一年小田切秀雄(文艺评论家)在文章中首次提到「与社会问题或意识形态等外在议题保持距离，将视线朝向内在的作家们」，是这个名称的来源。代表性的作家有古井由吉、黑井千次、高井有一、大庭 M nako，富冈多惠子，小川国夫、阿部昭、后藤明生等人。

举例来说，我在一九七二年写了一篇题为〈意义这种病〉【注³⁹】的文章，虽然谈的是莎士比亚的《马克白》，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着连合赤军事件。不过，文章里的概念，我从六〇年代初期就开始思考了。就如同之前说过的，安保斗争之后，「马克思主义结束了」的说法像大合唱一样，众人异口同声。七〇年以后则出现历史没有目的、历史没有意义这样的声音。八〇年代这些说法以「后现代主义」的姿态风靡一时。到了九〇年代，这些说法已经变成一种常识。但是，这样是行不通的；这种想法解决不了「意义这种病」。现实中，不是有宗教的基本教义派吗？今后，执着于「意义」，被「意义」附身的人，一定还会不断出现。

小岚-- 〈马克思，其可能性之中心〉在杂志《群像》连载，是一九七四年左右的事吗？

柄谷-- 是的。在那之前，我写的都是狭义的文学批评。但是我认为，文学批评不应该仅仅限于小说评论，至少，那不是我想作的批评。不过虽然有这样的想法，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不先在文坛确立自己批评家的身分，就不可能率性而为。

〈马克思·其可能性之中心〉之所以能在《群像》连载，只是刚好编辑部有那样的条件和意愿，纯粹是幸运。在那之前，文艺杂志是不可能刊载那样的文章的。但是我认为，这种东西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举例来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一点兴趣也没有；我想做的，是阅读马克思，而且是阅读《资本论》。这才是文学批评。话虽如此，以当时的文坛，竟然容许这样的东西连载，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³⁹ 《意义这种病》 《意义这种病》(论文集，一九七九，河出书房新社。一九八九年编入讲谈社文艺文库)。

3 一九七五年前往美国

小岚- 一九七五年，耶鲁大学邀请您担任近代日本文学的客座教授。有人认为这对您是个决定性的转变，您怎么看？

柄谷- 在文学批评方面，真要说有什么巨大的转变，那倒没有。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改变。比方《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注⁴⁰」一书，就是从在耶鲁大学的讲课内容发展出来的。事实上在那之前，我并没有认真读过明治时代的文学。为了在大学教课，才读了国木田独步等人的作品。然后在授课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掌握到了让近代文学得以成立的结构；那就是「风景的发现」，或者「言文一致」的问题。

但是比较大的变化不在文学上，而是发生在理论的方面。关于这一点，和比较文学教授保罗·德·曼(Paul de Man)注⁴¹的相遇对我而言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非常投缘，不过几乎没有谈过文学的话题。认识德·曼教授对我来说很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而是我第一次遇到，唯一一位完全了解我正在做的事、我想要做的事的人。要不是遇见德·曼，作为一个日本文学教授，我大概会无聊至死吧。

一九七五年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写过一些关于《资本论》的文章，他表示想要一读。于是我把〈马克思·其可能性之中心〉浓缩、改写、翻译成英文，把文稿交给他。他对这篇文章赞不绝口，并且打算把它刊载在他担任编辑的杂志上。我当然是非常高兴。举例来说，除了德·曼，我还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注⁴²成为知交；他对我的研究评价也很高，后来也在各方面提供我许多帮助。但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对我来说总觉得有点理所当然，并不觉得特别惊喜。但是被德·曼这样的人称赞，就真的是很高兴。更何况，他在同事与学生之间，是以严厉、辛辣出名的。

不过，等到杂志的编辑部来商谈论文刊登事宜的时候，我拒绝了。虽然德·曼认为论文当时的样子就很好，但我想要在回到日本之后，再作一些修改。实际上，一九七七年我回到日本后，开始重新改写。首先用日文，以《群像》杂志连载过的论文〈马克思·其可能性之中心〉为本，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和更动。我试着导入语言学的理论，来讨论货币和资本的问题。其成果就是一九七八年出版的《马克思·其可能性之中心》这本书。

但是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我就开始对里面的论述感到不足。我觉得光是以语言学的观点来思考货币的问题还不够，语言本身也必须再接受检视。更进一步想，数学也应该纳进来，所以又处理了数学基础论的问题。这些思考结成了〈作为隐喻的建筑〉这篇论文。之后我又把这些概念扩充，写了〈语言·数·货币〉一文。这些文章都是为了给德·曼看而写的。在这个意义下，我在理论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在那之前，我单纯只是个日本的文学评论家。

⁴⁰ 《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 《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九八〇，讲谈社）一书以精准锐利的方式颠覆了「历史主义普遍性」之基础，并且布置、架构了崭新的思考观点。

⁴¹ 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 83)，出身比利时、活跃于美国的文学理论家。倡导解构批评，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同为耶鲁学派代表性人物。

⁴² 詹明信 美国的思想家、法语文学研究者。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并且激烈地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当代思想、照相写实主义绘画等后现代艺术。曾为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之英译版作序。

小岚- 这样说来，七五年对柄谷先生来说，其实是个很大的转机。

柄谷- 应该是吧。那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在日本一路下来所从事的思想工作，就这样原原本本地搬到别的国家去，仍同样具有意义。感受到这个可能性，对我来说无比重要。到现在我仍然循着这个方向努力。

一般日本的知识分子，到西洋学习最先端的知识之后，回到日本向国人介绍其所学，自己也因此取得知识先锋以及开拓者的角色。要不然，就是固守日本特有而西洋阙如的东西，比如禅、日本艺术、京都学派的哲学等等，与西洋对抗。这两种立场我都不喜欢。话虽如此，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自己在日本一贯我行我素的思想工作，竟然行得通。

当然，为了照自己的方式思考，不得不限定研究的范围。举例来说，我的做法在文学的领域就办不到，因为语言的障碍太大了。日本人的英文再好，也有其限度。当然，的确有些人可以突破语言的障碍，比方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注⁴³】，他从东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担任英语文学教授，讲授维多莉亚时代的英国小说。他甚至帮他的朋友，著名的语言学家杭士基(Noa Chomsky)修改英文。但是这种人毕竟是少数的例外。

那些语言会造成巨大障碍的领域，我决定不做。因此，我选择研究马克思，特别是他的《资本论》。跟着我研究索绪尔【注⁴⁴】的一般语言学，接下来则是数学基础论，其结果就是〈语言·数·货币〉这篇论文。因为这些领域不管放在什么地方，都具有普遍有效性。在那之后，我进入康德；因为康德也是世界共通的，具有普遍的价值。不过我这么做并不是透过算计的结果，只不过自然而然朝这个方向演变而已。

当然，在日本我仍然以文学批评家的身分活动。比方说，我每个月在《东京新闻》撰写文学时评(结集成《反文学论》一书，一九七八年，讲谈社学术文库)。《马克思·其可能性之中心》里也不是只有马克思论，同时也收录了文学方面的论文。那个时期，我打算同时在两个领域工作。

文学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颇为轻松。选择论述的作品，也全部信任自己的直觉。对我来说，文学并不是理论。当然，我们可以用理论来说明文学；但是「文学批评」并不是知道了理论，就能够办到的事情。所以，虽然世间一般认为我是理论性的批评家，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研究文学方面的理论。

但是，〈语言·数·货币〉这类的理论就不一样。我真正研究过的，是这方面的理论；而且费尽苦心思考的，也是在这方面。后来因为工作忙碌难以兼顾，我决定放弃文学；但即使我专心在理论建构上，仍然进行得不是很顺利。〈语言·数·货币〉(收录在《反省与遯行》一书，一九八五年出版)中试图发展的理论遇到瓶颈，只好中途停下来。这个时候的瓶颈，破坏了我的健康。那是一九八三年的事。

因为生病，我决定到美国去，在哥伦比亚大学过了一段闲散的日子。但是正好在这时候，德·曼因为癌症去世了。不但在理论上遇到障碍，而且心中设想的唯一读者离开了人世，使我终于完全放弃这个工作计划。由于不得不放弃自己长时间以来从事的研究，那段时间成为我生涯中最痛苦难熬的日子。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的眼前突然展开了新的视野；其结果就是一九八四年开始写作的〈探究I〉。

〈探究〉是因为放弃了构筑体系的企图，才得以产生的。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当时也不知道；总之固定每个月把正在思考的事情写下来。〈探究I〉、〈探究2〉、〈探究3〉合计起来，总共在杂志上连载了十年以上。我在九〇年代的〈探究3〉中，开始有关康德的写作；最后它演变成《超越的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一书(二〇〇一年，批评空间出版)。

⁴³ 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 1928-)，出生于日本，美国的英语文学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名誉教授。著有《脱中心--日美摩擦的权力与文化结构》(日文版由佐复秀树翻译，一九九六，平凡社)。

⁴⁴ 索绪尔 索绪尔(1857- 1913)，瑞士的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被称为「近代语言学始祖」。对符号学也有很大的影响。著有《一般语言学讲义》等书。

4 朝向后现代主义批判

小岚- 可以说在一九八四年，您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结。举例来说，〈探究I〉开始运载的同时，您发表了〈批评与后现代〉（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海燕》月刊），一篇后现代主义【注⁴⁵】的批判。这个时期柄谷先生被视为后现代思想家的代表，甚至到现在还有人这样认为；因此这篇文章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它也对具体政治情势提出建言。

柄谷- 这个时期，我又回复了对外在世界的关心。在那之前，我将〈语言·数·货币〉的问题，当作一种形式体系来思考。但即使我做的是从形式体系内部进行解构的工作，再怎么说是也在观念论的世界里。放弃了这个工作之后，我才好像第一次看到包围在我们身边的外在世界。

一九八四年回到日本时，正好浅田彰【注⁴⁶】的《结构与力》在社会上造成一阵热潮，而且我的书也卖得很不错。难读难懂的书卖得很好，乍看之下好像是一种革命性的事态；但是我不这么想。

这个时期兴起的「当代思想风潮」，其实是法国哲学的风潮，在美国也是一样。为什么法国哲学会在当时流行起来呢？现在我这样想：法国的现代思想，其实是一种政治挫折的表现。现实上做不到，所以就转移到观念的世界里进行革命。一九六八年巴黎的五月革命时，有一句厕所里的涂鸦变成有名的标语：「让想象力取得权力！」。但是想象力真的取得权力，毋宁是在五月革命失败之后的事。

什么样的想象力？不会是文学；文学已经不再具有那样的力量了。相反地，哲学却向文学靠近。这一点只要看看德希达【注⁴⁷】以就会明白。一九六〇年代以前，德希达的工作的确很了不起。从现象学的内在批判，一直到结构主义的内在批判，他在哲学上的建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七〇年代以后，他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哲学家，还不如说更倾向于把自己视为「作家」。战前的海德格就已经是如此。他认为比起哲学，诗是更接近本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参加了纳粹之后，对纳粹感到失望所引起的。我想他以为真正的革命，只存在于文学，而不是像纳粹那样的政治吧。

像这样因为政治的挫折与不可为，而转向文学，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那只不过是因为现实的挫败，将希望寄托在语言的力量上而已。马克思曾经这样评论德国的观念论【译注：idealism，或译唯心论、唯心主义】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黑格尔左派的思想领导人：「哲学家们并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只是改变对世界的解释而已。」（〈费尔巴哈纲领〉）可以说，法国的现代思想从这里引伸出去，进一步认为如果改变了对世界的解释，世界也会跟着改变。所以对对他们来说，如何观看「文本」（text）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从这里产生的，是文本的观念论。

⁴⁵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原本指称一九八〇年代出现的一种倾向；对于拒斥装饰、服膺机能主义的「现代主义」采取否定的态度，极度主张回复折衷的型式。但是这个用语很快地转移、应用到其他的领域，其概念也有所转变；粗略来说，指称各式各样的「现代批判」。不同于建筑上的概念，「后现代主义」应用在其他领域时并没有特定的内容；现实上它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大叙事」而予以拒斥。

⁴⁶ 浅田彰 浅田彰(Asada Aki 1957)，一九八〇年代「当代思想风潮」的先驱人物。九〇年代与柄谷行人共同编辑《批评空间》杂志。虽然专攻经济学与社会思想史，但也在音乐、文学、绘画、建筑等各领域从事广泛的批评与介绍工作。历任京都大学助理教授、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现任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研究所所长】。著有《结构与力-超越符号学》（一九八三，劲草书房）、《对谈集-二十世纪文化的临界点》（二〇〇〇，青土社）等等

⁴⁷ 德希达 德希达(1930- 2004)，出身阿尔及利亚、犹太裔的法国哲学家，提出「解构」(Deconstruction)，「意义的离散性」、「延异」、「文体学」等概念，被视为后结构主要的代表人物。著有《马克思的亡灵们》、《无条件的大学》等书。

不过，过去德国观念论的情况也是这样。十八世纪末，在英国有发达的产业资本主义，法国在政治上有布尔乔亚革命，唯独在德国什么事也没发生。当时德国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就是观念上的革命。但是那绝不容小觑。事实上，德国的观念论，成为之后哲学思想革命的典型。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做的事，其实都是在反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所形成的那一段哲学史。

因为政治上的挫折与无力感，继而转向观念论的革命，这种例子日本也有；京都学派【注⁴⁸】就是如此。他们的学说虽然以佛教思想的「无」，或者西田所说的「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性」为根本的基础，事实上是德国观念论(费希特、赫德、黑格尔)的再版。我们也可以说，德国的海德格做的是同样的事。

事实上法国在战后导入海德格思想的同时，也引进了德国的观念论。德国虽然在二次大战中失败了，却在哲学领域上占领了战后的法国。德国的哲学语言与文体风格，取代了原来法国式的哲学与文学(以瓦乐希为代表)。引进日本的法国「当代思想」，其实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出人意料地，和日本过去的论述方式具有相当的亲和性。

总而言之，这样的思想流行的时候，在现实政治上是充满挫折的。不管看起来如何对政治充满关心，其根本还是无力感。实际上，处于美苏冷战结构之中，想要超越它(美苏冷战结构)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家在思辨式的想象力中追求「超越」。所以，哲学也好，其他的论述方式也好，都变成文学化的东西。七〇年以后，吉本隆明成为日本言论界的领导人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小岚 - 在《批评与后现代》(一九八五，福武书店)里，您提到了这个现象和「超越近代」译注⁴⁹的关联。

柄谷 - 近代西洋哲学的解构，由西洋人提出时还显得自然；但是同样的问题放到日本的脉络中，立刻就产生这样的反应：「什么，如果是这种东西，日本老早就有了！」战前的「超越近代」就是这样的东西。

很多人把我看成后现代思想家的代表。但是，我是最早开始批判「后现代」的人。一九八四年，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后现代」这个词只用在建筑等一小部分的领域；大概是因为我把这个词用在我的文章里，所以我被认为是后现代思想家吧。但我之所以刻意使用「后现代」这个词，是因为想到战前日本「超越近代」的现象。

⁴⁸ 京都学派 京都学派是以西田几多郎与田边元为首，以及其门生所形成的哲学学派，以西洋哲学与东洋思想内在的融合为目标。但由于他们对东洋的重新评价，以及独立主体性的追求，其学说助长了大东亚思想的形成。

⁴⁹ 超越近代超越近代(原文为「近代の超克」)原本是日本文艺杂志《文学界》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与十月的专题名称。在日本对英美宣战的当时，《文学界》邀集了十三名评论家举办研讨会，对明治时代以来影响日本文化深远的西洋文化进行总检讨，并且标榜对西洋文化的「超越」。专题内容在一九四三年结集成书，由创元社出版。战后文艺评论家小田切秀雄与竹内好等人，认为「『超越近代』在军国主义支配体制下，担任了「思想战」的任务，是企图消灭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运动」，虽然「意图形成思想，却导致思想的破坏」，其失败与大东亚战争的关系密不可分。

近代、现代等这几个词，日文和中文的习惯用法不太一样，所以「近代の超克」或许译成「超越现代」比较贴切。但是，考虑到日文与中文同样使用汉字，怕造成混淆，故保留「近代」二字。事实上，在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等各领域，对这几个时代的划分方式并不统一；

在英、法、德几个主要西欧语言中，用法也不一致。比方法文的「*temps Moderne*」与英文的「*early modern period*」，同样指日文的「近世」与中文的「近代」。精密的定义似乎是不可能的。

一九八四年的时候,「日本在经济上称霸世界」这种看法蔚为风潮。甚至有美国人写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这样的书。日本的经营技术很了不起;很不自然地,日本人突然变得自信满满,态度傲慢了起来。那时我就想,迟早有人会想要在哲学上表现那份自信;如果这样,大概会走向京都学派吧。结果事情的演变果真如我所预期,了无新意。

总而言之,一九八四年以后,因为泡沫经济的关系,连知识阶级的地位也浮涨起来。举例来说,大家认为商品畅销是因为广告文案的功劳,所以撰写文案的人变得举足轻重。「语言与差异化创造我们的世界」,这种文本的观念论进入了日常生活。但其实,让商品畅销的,并不是广告文案;一旦商品卖不出去,这个事实马上就变得很清楚。

这样的情势,令我十分厌恶。但无法否认地,自己在那之前从事的工作(〈语言·数·货币〉),也属于文本的观念论。为了克服这一点,我开始找寻其他的可能性,其结果就是《探I》与《探究II》。在这些文章里我使用了「他者」、「外部」之类的词汇,但是这些词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当时我试着从内部来否定文本的观念论,因而进行各种摸索;我不想只是以「它是观念论」为由来拒斥它。

我不知道当时的读者是怎么看待这些书。现在读起来,觉得那些论述非常抽象。只不过,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它不可否认的现实。虽然有人认为我那时候的作品比较好,个性鲜明,但那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的思想并没有变,只是针对后来的状况,已经无法再使用当时的语言。

小岚- 您开始担任《季刊思潮》(《批评空间》的前身)的编辑,是在一九八八年吧。

柄谷- 那是在剧作家铃木忠志⁵⁰的劝诱下开始的。如果是以前,我一贯拒绝和别人一起工作。但是那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想就试试看吧。事实上我没有想得很仔细,并没有长期的规画。不过一边做的时候,各种有利的条件逐渐汇集在一起。浅田彰在第四期加入了编辑群,从那一期开始杂志的路线清楚了起来,销售量也开始增加。两年后《季刊思潮》停刊,编辑群转移到别的出版社,开始了《批评空间》。那刚好是一九九一,波斯湾战争那一年。从那时候开始,我对政治的关心与涉入,变得非常明确。

⁵⁰ 铃木忠志 铃木忠志(1939-),剧作家、舞台剧导演。与唐十郎、佐藤信、寺山修司等人同为小剧场运动的代表人物。就读早稻田大学时代,就组成学生剧团「自由舞台」,毕业后创立「早稻田小剧场」,后改称SCOT,活跃至今。以富山县利贺村为据点,从事前卫戏剧的创作与演出。二〇〇〇年以来担任「舞台艺术财团戏剧人会议理事长」。著有《舞台导演的绮想(批评空间丛书)》(一九九四,太田出版)、《内角之和铃木忠志戏剧论集1、2》(二〇〇三,而立书房)、《戏剧是什么?》(二〇〇七,岩波新书)等书。

5 一九八九年走向康德

小岚- 一九八九年，美空云雀过世，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柏林围墙倒塌，天皇死去，结束了昭和时代。刚刚柄谷先生谈的，都和这些事件有所关联。其中特别是柏林围墙被拆除的时候，柄谷先生一定思考了很多事情吧。关于这一点，可以请您谈一谈吗？

柄谷-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苏联早已败坏，所以现实上它真的瓦解的时候，反而令我难以置信(笑)。我本以为它会以那个残破的样子，一直继续下去。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觉得，资本主义这一方才具有足够的力量，得以不断地将现状解体，构筑新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下，很讽刺地，好像反而对资本主义有所期待。可以说，是世界资本主义解构了苏联。可是当时我认为就算是这样，苏联的体制也会继续存在下去。

所以，九一年看到苏联在现实上真的瓦解，我首先惊觉到的，是对苏联的依赖。大家都说苏联的瓦解对旧左翼是个致命的打击，但事实上受到致命打击的是新左翼。在那之前，新左翼只要批判苏联、批判旧左翼就好了，或者去解构西洋形而上学，作一些观念的议论就好了。换句话说，新左翼依附于苏联和旧左翼而存在；而且当时怎么看也料不到苏联会瓦解，所以新左翼的立场很轻松。只要批判他们，就觉得自己好像有所作为。但是，当苏联与旧左翼在现实上崩解，这个态度就行不通了。

八〇年代风靡一时的「当代思想」，突然失去了解释现实的能力，也是这个原因。举例来说，德希达曾经谈论解构西洋形而上学，解构二元对立。乍看之下，这是一个宏大的企图，试着追溯到西洋历史的起源；

但是它之所以具有解释真实的力量，是因为它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换句话说，就是冷战结构。在日本，革命马克思主义派【注⁵¹】(黑田宽一)所说的「反帝国主义、反斯大林主义」，吉本隆明所主张的「自立」，也是一样的情形；试图在二元对立的情势之下，创造隐蔽的「第三条道路」。看起来象是哲学的抽象议论，之所以能够反映实际世界的真实面，乃因为政治的现实就是如此。

但是，苏联的瓦解与美苏二元对立结构的消失，同时也剥夺了哲学议论的现实基础。苏联崩坏之后，我们期待解构资本主义的力量出现；可是旧有的哲学词汇与修辞方式却无法适用于新的世界情势。结果真正出现在世界各地，解构原有资本主义的力量，不是哲学，而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面对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现实，该怎么办？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单单只是批判与怀疑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某种积极的理念。可是，在那个时间点，我并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对于规画、构想未来社会这件事本身，我一向持批判的态度。

阿多诺【注⁵²】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主张，否定的否定不应该是扬弃【译注⁵³】，而应该是彻底的否定。换句话说，不是抱持某种特定的目的或目标，而是永远持续地批判、否定现状。我和他的看法一致，所以从以前就常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并不是我们非得成就不可的某种特定状态，或是必须在现实中实现的某种特定理想。在真实世界中扬弃现状的运动，我们称它为共产主义。这个运动的各种条件，从当下现实的前提中产生。」(《德意志意识型态》)。

⁵¹ 革命马克思主义派 革命马克思主义派，是一九六三年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的一支。在新左翼团体之中，一向排斥其他派别，采取孤立的立场。七〇年代持续展开所谓「中核与革马派战争」。其特征是以「谋略论」分析情势。JR(日本国铁)总连(以旧动劳为母体)的会长松崎明，是革马派的副议长。八七年国铁分割与民营化时期，是唯一持赞成态度的劳工组织。之后的九〇年代，再度分裂为黑田派，以及以JR总连为中心的松崎派。

⁵² 阿多诺 阿多诺(1903-69)，犹太裔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作曲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美国，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性的思想家。他分析协助纳粹的一般民众的心理倾向，开发出一种威权主义倾向的性格检查方法，甚为著名。

⁵³

小岚- 柄谷先生在当时的《朝日新闻》上曾经这样表示:「真正的共产主义是扬弃现状的运动,和苏联的瓦解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句话让我记忆深刻,甚至还查出柄谷先生的住址,写信去表达我的仰慕呢。

柄谷- 的确有这么一件事。我还记得是用毛笔写的,很难看懂的一封信(笑)。只不过,我慢慢警觉到,只有这样的态度是不够的。就算持续「否定的否定」,如果没有任何理念,还是不行。马克思虽然说了上面那段话,事实上对他来说,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理念。马克思反对设计式的、强制施行的理念;但是他并没有否定「共產主义」这个理念。这个事情要怎么说明呢?我从康德那里学到说明的方法。

康德将「构成的理念」(建构性)和「统整的理念」(整合性)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或者换一个说法,他区别理性的两种用法:「构成的使用」和「统整的使用」。「构成的理念」是在现实中实现的理念;「统整的理念」虽然决计没有完全实现的一天,但是作为一种指标,我们必须向着它,徐徐地前进。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马克思所反对的,是构成的理念。

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的体系里,理念最终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和构成的理念有同样的性质。以唯物论的方式来解释这样的黑格尔,把共产主义当作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实现的理念,这就是通俗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把共产主义当作构成的理念之马克思主义,会带来什么结果?苏联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东西。那正是「理性之构成的使用」,也就是理性的暴力。但是,我们否定这样的东西,不应该连「统整的理念」也予以否定。根据构成的理念行动,而让自己受到挫折的人,后来对所有的理念产生全盘仇视的态度;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所有的理念,不过是虚构的故事,而予以否定。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理念是一种假象。但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想法。本来康德就说过,理念是一种假象。但是理念这种假象,和从感觉生出来的假象是不同的。如果是从感觉而来的假象,我们可以用理性来订正它。但是,有一些假象是从理性产生,原本就蕴含在理性里的。举例来马克思所反对的,是构成的理念。

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的体系里,理念最终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和构成的理念有同样的性质。以唯物论的方式来解释这样的黑格尔,把共产主义当作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实现的理念,这就是通俗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把共產主义当作构成的理念之马克思主义,会带来什么结果?苏联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东西。那正是「理性之构成的使用」,也就是理性的暴力。但是,我们否定这样的东西,不应该连「统整的理念」也予以否定。根据构成的理念行动,而让自己受到挫折的人,后来对所有的理念产生全盘仇视的态度;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所有的理念,不过是虚构的故事,而予以否定。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理念是一种假象。但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想法。本来康德就说过,理念是一种假象。但是理念这种假象,和从感觉生出来的假象是不同的。如果是从感觉而来的假象,我们可以用理性来订正它。但是,有一些假象是从理性产生,原本就蕴含在理性里的。举例来,一般人认为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是同一个「我」;但是就像休姆所说,同一的「自我」只不过是一种假象。那么,如果没有这种幻想(同一的「自我」),人会变得如何?会变得精神分裂吧。所以,这种假象不但不可缺,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特别把这种假象称为「超越论的假象」。理念也是超越论的假象,共产主义这个理念亦是如此。

超越论的假象(统整的理念)一旦消失,会怎么样?真要说的话,就是历史的精神分裂。先进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理念是虚构的故事(假象),嘲讽理念,对它嗤之以鼻,但是这样做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马上就会有人为了暗藏的目的,捏造出别的理念来。有些粗劣的、黑格尔主义式的观念论者,比方福山法朗西斯【注⁵⁴】,宣称美国的胜利带来自由民主主义的完全实现,因此历史已经终结。另一方面,在宗教上则出现毫不掩饰的基本教义主义。时代对理念的需求,一点也没有终止。那些嘲讽理念已经完结的知识分子本身,迟早会变成嘲笑的对象,要不就是为世人所遗忘。

所以在那个时期,我决定从根本开始,重新思考「理念」这个东西。因此我开始研读康德。通常康德被视为形而上学的批判者,我本来也这样想。这个普遍的看法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康德曾强调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受到休姆怀疑论的刺激所引起。但是一般人忽略了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的时期(一七八一年,一七八七年),形而上学正普遍受到轻视与嘲袖。

康德在他的序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曾经有过那样的时代,形而上学被称为各种学术的女王。如果我们将这个称呼解读成善意的,那是因为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是如此地重要,它受到这样的尊称也是实至名归的。但是当今形而上学受到各式各样毫不掩饰的轻蔑,已经变成一种时代的风尚了。」(转译自岩波文库上册,页14)把形而上学带入这种处境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独断的形而上学者。因此,对康德来说,他所作的「批判」的工作,毋宁是要将形而上学带回它应有的形,让它重新取得应有的地位。具体来说,那就是对休姆的批判;在接受了休姆的怀疑论之后,以其为基础,重建形而上学。

让我们借用康德的语言,稍微作一点修改:「当今共产主义受到各式各样毫不掩饰的轻蔑,已经变成一种时代的风尚了。」当然,共产主义者要为这样的情况负责。但是,我想要在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之后,以其为基础,重建「共产主义」这个「形而上学」。所以,康德是不可或缺的。

小岚- 谈到形而上学,在康德的思想里,事实上是道德(伦理)的问题吧。

柄谷- 没错。我认为社会主义根本上是伦理的问题。社会主义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经济的成长,资本主义就很好了。事实上,如果想要快速地让社会富裕,资本主义比较好。

但是,我认为社会主义是道德(伦理)的问题。虽然称之为道德,但并不是主观的问题。很多人在讨论康德伦理学的时候,常常谈一些什么不可以撒谎之类的、无聊的言论。所以马克思主义者看不起康德,三两句话就把他的学说打发掉。事实上,康德并不是只把伦理看成主观的问题;他所思考的伦理,毋宁是经济的问题。

对康德来说,道德的本质不是善恶,而是自由的问题。而所谓自由,指的是自发性的意思。举例来说,康德提出这个论述,作为道德法则:「不只把他人当作手段,同时也要把他人当作目的来对待」。当作目的来对待,就是将对方当作自由的(自发性的)存在。我们互相都把他人当作手段,(为了生存)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但康德所说的是,不可以把他人「只」当作手段;同时,我们也必须将对方当作目的(自由的存在)来对待。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所以康德主张避开商人资本的中介,提倡生产者的 *Association* (协同组合,公会)。他的主张比普鲁东还早了五十年。在这个意义下,普鲁东和马克思的学说,都可以看作是康德伦理学的延长。如果没有这样的伦理学作为理念,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顶多只是国家主义而已。

⁵⁴ 福山法朗西斯 福山法朗西斯(1952-),日裔美籍政治学者。新保守主义抬头时,为其代表性政治思想家之一。其后与新保守主义分离。主要著作作为《历史的终结》(1992)。

对我来说，比起苏联的瓦解，波斯湾战争【注⁵⁵】以(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月)对我造成更大、更具体的冲击。波斯湾战争强烈地让我感觉到，苏联的瓦解与冷战结构的崩坏，到底具有什么意义。

⁵⁵ 波斯湾战争 一九九〇年八月伊拉克海珊政权军事侵略科威特，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以此事件为借口，美国主导的多国籍军队强行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经过长达八年与伊朗的战争，加上原油价格下跌等种种压力，伊拉克海珊政权为了取得石油矿权，以军队占领了科威特全国。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决议对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同时美军以沙特阿拉伯为基地，大量进驻，并且在巴林设置军司令部，以最先进的武器持续大量轰炸，并以贫化钝弹【译注：一种以核废料「贫化铀」为主原料的合金所制造的弹头，带有放射性及强烈毒性，并且会产生高温延烧，具有类似烧夷弹的效果，杀伤力极强】攻击，造成伊拉克军队及一般平民大量死伤。之后并展开陆地战，伊拉克军队不敌，二月二十七日海珊承认战败。三月三日签订暂时停火条约。此次战争中，日本出资一百三十五亿美元供多国籍军队使用，同时在国内订立「PKO 协力法」（正式名称：国际连合平和维持活动等に**対する**の**協力関する**法律），使日本得以合法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日本并且派遣海上自卫队扫雷艇，为战后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开**啓**了历史上的先例。

6 波斯湾战争时期

小岚- - 一九九〇年开始，您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定期在那里授课吧？

柄谷- - 是的。一直到二〇〇五年为止，大约每隔一年去一年。

小岚- - 那是因为你计划在国外从事自己的工作吗？

柄谷- - 没错。不过，那时我也还参与《批评空间》季刊的工作，所以日本和国外两头跑。

小岚- - 一九九一年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您和中上健次【注⁵⁶】、田中康夫等人，举行反对日本参战的文学家集会。那是怎样的情形？

柄谷- - 那是中上健次提议的。只要我和中上合作什么事情，结果总是我站到台面上来。不过，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大概不会有任何行动吧。每次我参与或涉及什么活动，大多是像这样被动的状态；从来没有自己仔细思考、计划，带头从事的活动。

冷战体制结束这件事，第一次浮到表面来，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波斯湾战争。举例来说，在那之前，日本处于美苏冷战体制之中，只要静静不动，什么也不要做就好了。但是，日本突然被要求参战，而且是以联合国的名义。我们该怎么做呢？在此之前就算不去想也没关系的事情，就算要思考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事情，突然一起出现在我们眼前。

那个时候我觉得，六〇年代之后我们通用的、惯用的作法和思考方式，已经行不通。比如说，之所以举行「文学家的集会」，并不是要赋予文学家特权；相反地，我们想透过这个行动，来推翻一般人认为文学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看法。所以我们举办了文学家的集会。文学家们集合起来，签名联署，并发表「反对日本参战」的声明，这件事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但是在六〇年之前，这是很常见、很普通的事。后来社会上之所以不能认同这种行为，应该是受到吉本隆明的影响吧。还有，处于这种影响下、全共斗出身的作家们，让文学家的政治参与，变成一种禁忌。我们就是想要破除这个禁忌。不过就如我预料，因为这件事，全共斗出身的作家们（例如加藤典洋等人）对我的批判，持续了好几年，甚至还为此出书。我忍不住觉得他们这样的热情真是徒劳无功，搞错重点。

小岚- - 您在一九九二年开始连载的〈探究III〉上讨论康德，是因为发生了波斯湾战争吧。波斯湾战争之后，您发表文章，表示应该赋予宪法第九条积极的意义；这也和康德有关吧。

柄谷- - 正是这样没错。因为波斯湾战争，日本宪法第九条才开始产生了意义。在那之前，日本处于美苏对立的夹缝中，不可能有什么自己的立场；即使讨论宪法第九条，也没什么意义。旧左翼也好，新左翼也好，其实都对宪法第九条漠不关心。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为了自己立场的方便而主张反战，但从没想过要废止军备。举例来说，如果是「人民军」他们就不反对了。新左翼也是，自己还组成「赤军」。他们只有在对自己的立场有利的时候，才会搬出宪法第九条来。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开始思考宪法第九条的事情。一边思考，才明白了宪法第九条的精神来自康德的〈论永久和平〉；同时也才了解，康德是预感到法国革命之后可能会发生战争，才写下他对和平的构想。在那之前，我或多或少觉得「和平运动」有点傻气而看轻他们；那时候我才第一次认清，事情并非如此。

⁵⁶ 中上健次 中上健次(1946- 92)，小说家。高中毕业，在羽田机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之后，开始写作。与柄谷行人交往，创作以纪州熊野为舞台的小说，构筑独特的作品世界。一九七六年以《岬》获得芥川赏，为战后出生小说家之第一人。因肾脏癌去世。代表作有《枯木滩》（一九七七，河出书房）、《大地的尽头·至上的时光》（一九八三，新潮社）、《火祭》（一九八七，文艺春秋）、《异族》（未完成，一九九三，讲谈社）等等。

小嵐- 一般认为「探究III」的康德论后来演变成《超越的批判》(跨越性批判)【注⁵⁷】可以说明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柄谷- 原本我只是暂停〈探究III〉的连载,开始写〈康德与马克思〉这篇论文,到后来连载就真的停掉了。因此,〈探究III〉并没有集结成书。虽然这样,〈探究III〉的内容,几乎全部出现在《超越的批判- 康德与马克思》里,所以才会有《超越的批判》是从〈探究III〉演变而来这种说法。在理论方面,我觉得自己在一九九八年有重大的突破。「资本=国族=国家」这个观点,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遭遇「国家」和「国族」时,总是失败。马克思主义把国家与国族,看成和哲学或文学一样,是一种意识型态式的上层结构,受到经济结构所制约。但是这种看法却无法处理国家和国族的问题。换句话说,败给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了反省这个问题,思想家开始讨论上层结构的相对自律性,但是仍然把国家和国族放在原有的次元上来思考。法兰克福学派【注⁵⁸】召导入了精神分析,也加进了各种神话学、符号论的观点。「共同幻想」(吉本隆明)、「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等等,也是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些议论,只是把国家和国族当作表象或幻想来解释。

我认为国家与国族,和文学或哲学是不一样的。主张文学、艺术、哲学由经济的下层结构所制约,还有主张它们相对于下层结构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拥有独立的次元,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国家和国族,就讲不通了。虽然国家和国族的确具有意识型态的结构,但是如果真的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体系。

只有在近代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才能够区隔态(乙、丙)开来,分别看待。举例来说,在封建体制之下,封建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既是经济的关系,也是政治的关系,两者无法分离。封建领主对农奴所施行的、政治上的压制,原封不动地,就成为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下层结构和政治的上层结构,没有办法分开来;未开化的社会更是如此。所以,把国家和国族看成上层结构,只能拿来观察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

我从这里想到个观点:国家与国族是从不同于「商品交换」的、其他的交换模式衍生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交流模式,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具有幻想性质的体系。于是我想到,也许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以其他的基础交换模式来说明国家与国族。换句话说,国家与国族不只是表象,而是有它必然的根由;正因为如此,它们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东西。图一的甲栏,是四种基础的交换模式;乙栏和丙栏则是历史上从这些交换模式衍生出来的社会、政治型态。

甲	B 掠奪與再分配	A 贈予的互酬制度
	C 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	D ×
乙	B 專制、封建國家	A 農業共同體
	C 都市	D 普遍宗教
丙	B 國家	A 國族 (Nation)
	C 資本 (市場經濟)	D Association

圖一 基礎交換模式(甲)及它們在歷史上所衍生出來的形態(乙、丙)

⁵⁷ 《超越的批判》 《超越的批判- 康德与马克思》收录在《定本/柄谷行人集》第三册(二〇〇四,岩波书店)。以康德的观点阅读马克思,并且以马克思的观点阅读康德,受到推崇。作者明白揭示社会主义的伦理根据,同时对于我们面对将来的社会所应有的实践,提出构想。从不断的「位移」中取得视点的差异,从不同的视点进行批判作业,作者的实践提供了杰出的范例。

⁵⁸ 法兰克福学派纳粹崛起后的德国,以霍克海姆、阿多诺、班雅明、佛洛姆、马库色等人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形成透过批判理论研究哲学的集团。纳粹政权成立之后,活动据点移往美国。

马克思从「生产模式」的观点，来思考社会结构体的历史，也就是通称的历史唯物论。他把社会结构体分成原始共产制、亚细亚式、古典古代式、封建制、资本制等阶段。在粗略的原则上，我并不反对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从「交换模式」而非「生产模式」的观点，重新思考这些社会型态。不管哪一种社会结构体，都是由各种不同的交换模式结合而成；也就是（A）赠予的互酬、（B）掠夺与再分配、（C）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等。社会结构体的不同，取决于哪一种交换模式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还有各种交换模式结合的程度或浓度。

即使在原始社会阶段，也同时具有这三种交换模式，只不过A具有支配性的力量，其他的模式并不明显。还有，在亚细亚式与封建制的社会结构体之中，B是支配性的模式，但是A和C也同时存在。换句话说，一方面已经出现货币经济与都市，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农村共同。接下来的阶段，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体以C为支配性的模式，不用说，A和B也都残留下来；只是在C的支配性力量的影响之下，产生了变形，演变成「资本=国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体。

接下来重要的是D这个交换模式。某种意义上，D可以看成在较高次元上，返回到A。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以之为基础，回复到A(共同体)的交换模式。这代表了扬弃旧有的A、B、C也就是扬弃了「国族=国家=资本」。

但是D和其他交换模式不同；D这个交换模式实质上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们可以说，从祆教【注⁵⁹】以来，D以普遍宗教的型态，持续出现在历史上。

D从十九世纪后半起，宗教的色彩消失，转变成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样貌存在。但是，社会主义本来并不是计划经济之类那种层次的问题。社会主义是普遍宗教的理念之延伸。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称为是国家主义(B的支配)。之所以说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道德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A、B、C这三种交换模式执拗地持续存在；但是，D也是如此。以康德的话来说，D作为一种「统整的理念」存续着。一九九八年，上述的想法突然一起出现。在那之后，我写了《超越的批判》和《迈向世界共和国》(二〇〇六，岩波新书)，试图将这些想法精密化。现在我还是持续进行这样的工作。

⁵⁹ 祆教 祆教，纪元前十三世纪(一说纪元前七世纪)发源于巴尔赫(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区的一种宗教，由琐罗斯德创立。以善恶二元论为特征，尊崇光之象征「纯粹之火」，故亦称拜火教。

7 新 Association

小嵐 - 二〇〇〇年您推行 NAM 运动，也是因为对未来有这样的愿景吧。

柄谷 - 要这样说也可以，不过事实上是一面推行运动，一面进行思考的。其实应该要更慎重地做事前的准备；不过要是这样的话，大概就不会付诸实行了吧。

另外，在那个时期开始推展运动，一方面有理论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实上的危机感。一九九〇年代，日本开始施行「新自由主义」，建立了随时都可以发动或参加战争的体制。我在编辑《批评空间》的时候，试图抵抗这个趋势，但是那个抵抗终究是无力的。我开始想，单单靠批评是行不通的，所以决定开始推动社会运动。

我认为二〇〇一年小泉出任首相之前，日本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已经完全建立了。一九八〇年代里根与撒切尔的政策与主张，已经是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话，则是透过中曾根的手实现。其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国铁的民营化【注⁶⁰】，国劳（国铁劳动组合）也同时解体。国劳是总评【注⁶¹】最重要的成员，国劳的解体也意味着总评的解体。一旦总评解体，社会党也就消灭了。

接下来，是对日教组（日本教职员组合）的镇压，政府开始控制教育。所谓的大学民营化，实质上是国营化。在那之前的大学，即使国立大学，也是独立在文部省之外；换句话说，是一种中间势力。透过所谓的民营化，大学的自治权被剥夺了。私立大学也一样；国家在扩大财政援助的同时，也强化了对大学的控制。

还有一点不得不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透过让公明党加入联合政权，把创价学会纳入体制。为了参与执政，他们放弃了长年以来一贯的课题，也就是大众福祉与反战。这样一来，曾经是中间势力的宗教势力，在事实上受到压制，不能动弹。另外一件，就是对部落解放同盟【注⁶²】的镇压。在过去，不限于部落【注⁶³】部落解放同盟还支援所有受到歧视的弱势团体运动；同时他们也是制衡右翼的力量。解放同盟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之后，右翼分子开始明目张胆地摆出「天下尽为囊中物」的嚣张态度。

⁶⁰ 国铁的民营化一九八二年成立的中曾根康弘政权，其最主要推进实施的政策，就是国铁（日本国有铁道）的分割与民营化。国铁民营化之后，中曾根并且以宪法改革为借口，解散「国劳」与「总评」。国铁内的各个工会除了「动劳」（国铁动力车劳动组合，驾驶员的工会）之外，几乎全体选择以「遵法斗争」【译注：又称顺法斗争，故意按照字面意义死板地执行法规，以达到怠工目的之抗争手段】的方式，来反对分割与民营化。动劳千叶（国铁千叶动力车劳动组合）则发动了两波的罢工。在国铁分割与民营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员工遭到解雇，民营化之后的新公司亦拒绝雇用，导致许多原国铁员工自杀。各地方的劳动委员会在接受遭解雇者的申诉之后，作出「国家违反劳动法」之裁决。

⁶¹ 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 「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成立于一九五〇年，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工会的中央组织。以变革资本主义、支持日本社会党、推行反战和平运动为方针。一九八三年时一度拥有四百五十一万名会员，其中七成左右是国营企业的劳工。一九八九年解散。之后虽然有后继组织企图接续总评的政治活动，但已经失去影响力。

⁶² 部落解放同盟 继承了战前「全国水平社」的历史传统，一九四六年「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在松本治一郎的领导下成立。一九五五年改名为「部落解放同盟」，以反对行政歧视的斗争为主轴，改善部落的恶劣生活条件、争取部落的权益为宗旨，推行社会运动。一九六三年发生的狭山事件【译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日本埼玉县狭山市发生一名十六岁高中女生遭杀害事件】中，部落青年石川一雄遭诬陷逮捕，为了声援石川一雄，部落解放同盟推动「差别（歧视）裁判（审判）纠弹斗争」，支持石川再审的要求。在这期间，同盟中源自日本共产党系的成员，反对「反差别斗争」，组成分裂组织。一九八九至九一年，日本政府全面废除「同和对策事业」【译注：一九六九年由国会立法，改善社会不平等待遇的措施】，禁止差别纠弹斗争，部落解放同盟面临前途的抉择。另外，为了声援三里冢斗争【译注：日本千叶松成田市三里冢地区，反对政府为了兴建成田机场强行征收土地的农民抗争】，以及持续推动差别纠弹斗争，产生了更新部落解放运动的需求，九二年解放同盟改组，结成「部落解放同盟全国联合会」。

⁶³ 部落「部落」一词在日文中有两个意思。其一和中文用法相近，指的是因地缘关系形成的小型共同体，由少户数的民家构成。另一个意义则是社会上相对弱势，因为血缘、种族、职业、阶级等等理由受到歧视的人，以及这些人居住的地区。

二〇〇〇年，日本的中間勢力几乎消灭殆尽。这时候，小泉政权出线，放眼望去，已经没有任何足以抗衡的力量。小泉把少数残存下来的中間勢力，贬称为「守旧派」、「抵抗勢力」，一扫而空。

小嵐- 真的是这样。当时小泉纯一郎毫无例外地，受到各界一致的支持。现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人，那时候也都对他鼓掌叫好。

柄谷- 对于现有的政党或中间团体，我们已经不能寄予任何期望了。就因为这样的状况，我构思了 NAM，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 Association 运动。简单地说，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第一、旧有的革命运动向来把重点放在「生产」过程，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总罢工上面。为了积蓄能够发动总罢工的实力，十分重视能够提高劳工「意识」的运动。还有，为了组织劳工，由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党变得不可或缺。

但是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重要的应该是「流通」过程。资本本身，是透过 $M - C - M$ (货币 - 商品 - 货币 + a) 这个转变来增殖。在这一点上，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资本之所以能够增殖，最终必需透过流通的过程。谈到剩余价值的榨取，通常只考虑到生产点；但是，不论如何使用残酷的手段来榨取劳动者，如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就不会有剩余价值出现。

那么，是谁在买这些商品？基本上是劳动者。这就是产业资本主义经济。在商人资本主义的阶段，主要商品是远距交易的奢侈品，购买者只有贵族和富人。但是在产业资本主义，主要商品是日常用品。

大家常说，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劳动力商品」；换句话说，需要无产阶级，也就是用工作换取酬劳的劳动者。但是，为什么一定需要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使用奴隶或农奴？并不是奴隶和农奴制度违反近代人道主义原则。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是因为无产阶级会购买商品，而奴隶不会。产业资本不只需要劳动者，还需要消费者来购买其产品。

劳动力商品制造出来的商品，卖给劳动者本身，所谓近代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系统。资本就是靠着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差额(剩余价值)来自我增殖。产业资本划时代的创举，就在于形成了「自我循环再生」(autopoiesis) 的系统。劳动者为了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不得不购买劳动力这个商品本身所生产的商品，就是这样的系统。在这一点上，和奴隶制等其他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商人资本需要远距交易；换句话说，需要在因为空间产生的不同价值体系之间，从事中介的工作。某个东西在便宜的地方买进，然后运到贵的地方卖出，中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不过为了这个目的，商人资本必须冒相当的风险；实际上古代的远距交易，都是由国家来进行的。与此不同，产业资本在身边发现了一个新的商品，就是劳动力。劳动力不只亲自生产商品，还自己买回去。因此，不像商人资本，产业资本不需要在不同的空间之间担任中介。雇用劳动者，再让他们买回自己生产的东西，产业资本只需要中介这其中的过程就可以了。

但是也因为这样，产业资本必须制造价值体系间的差异。粗略来说，商人资本里的差额，来自不同地域生产物的差异，这是由自然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产业资本里的差额，必须在时间中制造价值体系的差异，才能得到。这一点是透过技术革新来产生。也就是说，透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让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下降。所以对产业资本来说，永不停止的技术革新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资本并不在意剩余价值是从那种差异得来的。举例来说，产业资本也会因为寻求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向远距发展；或者也会从金融投机中，获取差额。但是基本上，产业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最主要的基础，是透过技术革新，在时间中产生价值体系的差异。一旦技术革新停滞下来，剩余价值也一定会停滞下来。

顺带一提，剩余价值和利润是不一样的。利润是我们可以实际经验中感知的东西。个人或者是个别的企业，意识到利润的存在，并且以之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是从经验里没有办法了解剩余价值，它是一种理论上的概念；剩余价值不能从个别资本，只能从总资本的层次来思考。举例来说，四个朋友打了一整夜的麻将，最后总有人得到「利润」。但是从全体看来，并没有「剩余价值」。只有从外面带进来某个好骗的家，才可能产生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在同一个体系中，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没有「差异」，就没有剩余价值。

把利润等同于剩余价值，很多事情解释不通。比方说，以个别企业的角度来看，得到利润的企业，我们会认为他们压榨劳动者。那么，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企业要如何看待？难道就认为他们没有压榨劳工，是一群有良心的家伙吗？简单地说，剩余价值这个概念不能用在个别的案例中。虽然这样说，我们不能否定剩余价值的存在。以总体来思考「资本的蓄积 = 存续的命脉」，剩余价值这个概念是不可缺的。

如果观察「产业资本的蓄积 = 存续的条件」，就会了解抗争点要放在哪里最有效果。在生产点上来看，劳动者贩卖自己的劳动力，处于「卖方」的立场。但是在流通，也就是消费的场所，劳动者是处于「买方」的立场。虽然在生产点上资本居于优势，但是在消费的场所，相对于劳动者（这时候是买方），资本处于从属的地位。不过如果不这样做， $M - c - M$ 这个过程就没办法完成。

一般的观念认为，消费者运动和劳工运动是不同的两件事。但是，这世上没有人是只从事消费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人。劳动者在消费的时候，就变成消费者，如此而已。如果是这样，劳动者不应该只站在他们最弱的立场（生产点）上战斗，而应该以消费者的立场战斗。处于生产点上，劳动者很容易和企业一体化。因为企业如果得到利益，对劳动者来说是好事。所以，举例来说，即使企业生产受到污染的食品，劳动者很难提出反对的意见，或者将内幕暴露给社会大众；因为公司若因此倒闭，劳动者的生活也会陷入窘境。但若是以消费者的立场来看，就不能容许这样的事发生。所以，当劳动者站在消费者的立场的时候，比较容易抱持普遍的、公共的态度。

很多人认为如果不从生产点着手，就不是劳动者的斗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是这样想。他们认为劳动者之所以不能站在客观普遍的立场，是因为缺乏阶级意识，因为他们被封闭在物化的意识里。所以，知识分子和前卫党，必须担任劳动阶级的启蒙者，必须领导他们。但现实上，生产点的斗争非常困难。以现代企业的生产方式，劳动者碰面、互动的机会非常少。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看法认为不应该以劳动者的斗争为优先；消费者运动、弱势族群等等，斗争的多样化比较重要。最近这种看法居优势。但是，这两种观点，关于「资本的蓄积 = 存续的条件」这件事，都只各自看到其中的一半。

重新再说一次，劳动者和消费者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人。劳动者消费的时候，就变成消费者。如果是这样，劳动者就不应该「只」站在自己最弱的立场（生产点）上战斗，而应该以消费者的立场战斗。在这里我所想到的，是创造出一种「劳动者/消费者」运动。具体地说，就是把劳工运动和消费者运动结合起来。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点，和前面所说的有关。除了以「劳动者=消费者」的身分和国家与资本对抗之外，同时，NAM的目标在创造出一种不需要依赖国家或资本的体系，也就是经济上的 **Association** (生产=消费的协同组合与地方货币、信用体系)。这不需要等到将来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再来实行，而是现在、马上就可以做。当然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是部分的、区域性的运动。可是如果不开始这样做，结果只不过又演变成依赖国家而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已。

当然，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协同组合、地方货币等等，从以前就有了，并不是我想出来的东西。我只是提出一个理论，赋予这些运动新的意义而已。

8 九一一事件的当时

小岚- 二〇〇一年，发生了九一一事件，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成员还在各地同时发动反美游击战。当时您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柄谷-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事实上，一直到九一一之前一个礼拜，我还在纽约。但是，事件发生后，以组织的立场来看，NAM要如何应对，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本来在发起NAM这个运动之前，计划就不够精密；我原本希望一边进行，组织会一边自己慢慢成形。这是我一贯的作风；仔细地计划、和大家达成协议再开始，这种事情我做不来。不过，其实应该要这样做才对。

只要同意NAM的原则，我们不拒绝任何想要来参加的人。但是这样的组织方式没办法应付突发事件。NAM的成员有很多是我的读者，或者应该说是《批评空间》的读者；对他们来说，NAM像一个热闹的聚会，所以不喜欢过度深入的参与，也不愿意参加像示威这种行动。所以九一一之后，粗略来说，NAM分裂成两半。

有一半的人希望像地方货币或是公平贸易【注⁶⁴】那样，从事温和、渐进的运动。另外一半，则属于典型左翼运动类型的人。要是运动能够慢慢地进行，这两种类型的成员之间应该会产生交流，达成某种平衡。但是比起九一一本身，之后情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参战这个紧急的政治问题，更迫使NAM不得不提出反应。刚刚成立不久的组织要如何应对这种事情？组织里协商的机制也还没有建立。有些成员不愿意参加政治斗争；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说，想参加的人参加就好。本来就是一群不同类型的人，才刚集合起来不久，没办法作出一致的决议，内部开始兴起各式各样的对立。所以，我决定解散NAM。

如果没有九一一之后的事态，我想NAM的发展一定会不一样。不过对我来说，累积这一类的经验是一件好事。

小岚- 不只是NAM解散了，《批评空间》也停刊了。

柄谷- 我在九〇年代，就强烈感觉到《批评空间》达到了它的极限。我认为那不只是这份杂志的极限，而是「当代思想」和「文学批评」的极限。九〇年代末期，我就不想再继续了；不过考虑到总编辑内藤裕治先生，才想说如果换个形式，再做下去或许可行。于是我们用「生产协同组合」的方式，成立了「批评空间社」；它变成了NAM的一环。但是内藤在二〇〇二年因为癌症突然过世，批评空间社也就解散了。内藤还担任了NAM许多重要的工作，可以说他的过世也是NAM解散的原因之一。我有一半的时间待在美国，内藤走了以后，就找不到人可以担负实务工作了。

但是，虽然NAM解散了，原来的成员，各个Association，反而很认真地在各自的领域继续努力着。现在我在《at》这本杂志持续地写文章，也可以看作是NAM的延续吧。反过来说，NAM这样的组织，本来就是「Associations的Association」，所以如果个别的小型ASSOCIATION本身不够健全，运动反而推展不开来。假使个别Association可以好好地发展，再来就是等待有才能的组织者将它们串连起来了。

小岚- 九二之后的情势，是否引发您某些特别的思考？

⁶⁴ 公平贸易 公平贸易(Fair trade) 运动旨在创造一个公平、没有贫困的社会，希望贸易双方能够基于对话、透明性、相互的敬意，建立伙伴关系。以合理正当的价格持续向开发中国家购买原料或制品，同时对开发中国家的农村女性、小农家、都市贫民区的居民等，提供实质的援助。运动的成员中也有大型的企业。有些批判针对他们价格的设定是否公正，提出质疑。

柄谷 - 「国家」的问题。《超越的批判》里虽然也讨论了「国家」,但是因为九一一事件,让我重新想到一点,就是「国家是相对于其他的国家而存在的」这个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都只从国家的内部来思考国家。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国家是从社会衍生出来的。纳格利和哈伯玛斯【注⁶⁵】也是这样想。所以他们认为国家只要以社会的共识(公共的合意)为基础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国家」并不会顺从社会的共识行事,也不会因为社会的共识希望它消灭就消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并不是从社会的内部产生的,而是相对于其他的社会、其他的国家而存在的。所以即使解决了社会内部的问题,外在(其他的国家、社会)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我在《超越的批判》一书中,以肯定的态度强调马克思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极力强调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或施蒂纳【译注⁶⁶】)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自从巴枯宁【译注⁶⁷】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却持续地批判马克思是个极权主义者。但是我在书里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或是 Association,马克思和普鲁东基本上看法并没有什么不同。

九一一之后我的看法有些许改变。毋宁说,马克思的弱点就在于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从早期开始,就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自我异化的状态【译注⁶⁸】。所以,他认为只要能够扬弃市民社会的矛盾(阶级对立),「国家」就会消灭。这和普鲁东的想法是一样的。只不过,马克思认为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必须先暂时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这个想法(无产阶级独裁)是从布朗基【译注⁶⁹】那里得来的。布朗基根本上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国家」很快就会消灭。

但是我认为,从「国家」的本质和起源来看,「国家」是相对于其他的国家而存在的。所以,不顾国与国的关系,单独一个国家想要扬弃「国家」,是不可能的。当然,马克思构思的也不是单独一个国家的革命。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他就有了「世界革命」(世界同时革命)的构想。不过,这个想法套用到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也许说得,但再怎么说明那只不过是发生在一部分的欧洲而已。这样就要称为「世界」,未免过于自大。他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我觉得,倒是康德「永久和平」的理念,还比较切中「国家的扬弃」这个课题。这一点我在《超越的批判》中也稍微提到,但是在九一一之后,我更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其结果就是《迈向世界共和国》这本书。

⁶⁵ 哈伯玛斯 哈伯玛斯(1929-) 德国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与施密特(1931-) 等人并列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世代,是公共领域论与沟通理论的先驱者。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等等

⁶⁶ 施蒂纳 施蒂纳(1806- 1856), 德国哲学家,被视为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之一,特别是他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对后世思想家有很大的影响。麦克斯 施蒂那是他的笔名。

⁶⁷ 巴枯宁 巴枯宁(1814- 1876), 俄国思想家、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无政府集产主义(又名集体无政府主义)

⁶⁸ 自我异化 自我异化或自我疏离在这里有特定的意思。按照马克思的想法,这里的意思是市民社会经过公共的合意(共识)产生「国家」,却反过来受到「国家」的支配。

⁶⁹ 布朗基 0 布朗基(1805- 1881), 法国社会主义者、革命家。主张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透过秘密结社的少数武装精锐分子取得政治权力,并且必须经过武装人民的独裁阶段以导入社会主义制度。他的主张在左翼论述世界里称为布朗基主义。

小岚-《迈向世界共和国》因为收录在岩波新书系列里，所以篇幅不大，但是内容非常浓缩，而且相当体系化。我觉得它说不定是柄谷先生的著作中，体系最完整的一本书。

柄谷-本来我很不喜欢体系，也从来不想建构什么体系。但是如果要以交换模式相互依存的接合方式来看待社会的构成，就不得不用体系的方式来思考。

事实上，我开始思索这个问题的時候，重新思考了黑格尔的理论，他的《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里，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然后是国家、国族，以这个顺序综合起来。「国族」一开始只是显现为以感性为基础的「民族」，最后则会转变成一种理性的存在，以有机的方式统合市民社会与国家。当然，在他的看法里，所有过程中的所有要素，都会在透过「国族」的统合中遭到扬弃(否定、保存)。

早期马克思的思想，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注⁷⁰】开始的。在他的批判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下层结构，国族或国家都是上层结构。如果我们消除下层结构的矛盾，废弃资本制经济，那么国族（此国族本书中同“民族”）和国家也都将消失。但是现实上并非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国家和国族的问题上绊倒。马克思没有认识到，国族和国家的基础，是建立在商品交换之外的、其他的交换模式。

黑格尔是个观念论者，而且他把「国族」放在最崇高的位置。但即使如此，我认为黑格尔确实掌握到国族、国家与资本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当我开始把「资本=国族=国家」当作交换模式的结合体来思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是向黑格尔靠近了一步。但是这也表示，我必须再一次重新对黑格尔提出批判。

一九八九年，福山主张因为自由民主主义的实现，历史已经走到它的终点。当然，这个看法是以黑格尔的理论为基础的。但是换成我的语言来说，福山看成历史终点的「自由民主主义」，其实不过就是「资本=国族=国家」。不用说，这不可能是个END(终点、目的)。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对黑格尔的批判，而且这不只是哲学家这个小小的圈子里的问题。

⁷⁰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撰写了〈黑格尔国法论批判〉一文。在文中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以社会角度来看的国家)是基础，政治上的国家则是市民社会自我异化的状态。马克思并且以此观点批判黑格尔。「如果解决了市民社会的阶级问题，『国家』就会消灭」这个观点，就从这里产生。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黑格尔的一个洞见，那就是「国家的主权是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所产生的」。

第三章 现状分析

1 历史与反复

小岚- 柄谷先生告诉了我们，您从一九六〇年代到现在，思想演变的过程。接着想请您再谈一谈，自从一九九一年苏联瓦解，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后的世界现状。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唯一的帝国；您觉得实际上如何？

柄谷- 最近美国的没落愈来愈明显，所以几乎没有人这样说了，否则在一九九〇年代的时候，美国独胜、美国是超级强国等等，这一类的看法压倒性地居多。我那时候就反对这种看法。从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到美国居住，我就感觉到这个国家正逐渐地没落下去。记得在一九八〇年，我听到一件令我非常惊讶的消息：美国的下一代变得比上一代贫穷了；在那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这是史上第一次。不过现在日本也是一样，儿女这一代，变得比父母那一代贫穷了。

我认为美国的黄金时代，在一九七一年，美国废除美元的金本位制度【注⁷¹】时就结束了。在那个时期之前，对于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一直是站在「赠予者」的立场。在这个情况下，一九七〇年代日本和德国急速地成长，开始对美国产生威胁。

波斯湾战争时，纳格利（奈格里）和哈德（哈特）赞许美国在发动战争之前，先征求联合国同意的举动，认为这个做法和从来的帝国主义是不同的，并且把美国比喻为古时候的罗马帝国。这个说法非常得到美国政府的欢心。但是，波斯湾战争的时候，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拿出九十兆日元左右的资金，那些钱用到哪里去了我们不得而知；大概拿来把美国的武器库存一扫而空吧。花钱雇用佣兵来打仗的帝国要多少有多少，大多数因此而灭亡；但是，如果没有别的国家出钱就没办法打仗，历史上应该没有这种「帝国」吧(笑)。

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战争时，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了；美国并不是什么超越了「帝国主义」的东西。无视于联合国的反对，还嘲笑反对战争的欧洲诸国，硬是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接下来就是二〇〇七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崩溃。不过这件事在一九九〇年就可以看出来了。美国的经济虽然在金融方面很强大，但是在制造业方面早已没落；所以才会要求日本出钱，否则仗打不起来。

小岚- 这样说起来，我们有必要回到一九九一年、苏联瓦解的时候，重新思考。柄谷先生在那时，已经预见到后来一连串的发展了吗？

柄谷- 只能说一半一半。关于现状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的预测，我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一九八四年的时候我曾经预测，一九三〇年代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会在一九九〇年之后，以类似的型态重复出现。八四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与后现代〉，就表示日本的后现代主义，大概会演变成与战前「超越近代」思潮类似的东西。后来，一九八九年苏联的瓦解与昭和天皇的死一起发生，我又更确认了这个想法。

⁷¹ 美元金本位制度的废除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在美国贸易赤字增加、美元价格滑落的经济背景下，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停止美元纸币的金本位制度。战后的布列顿森林体制(Brton Woods system)【译注：一九四四年七月，联合国四十四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滑雪小镇布列顿森林市举行有关国际货币体制的会议，因而得名。虽然会议的决议有诸多内容，但主要是指美元与黄金保持固定的立换价格，同时以美元为国际基本货币，并且限制国际汇率的变动率】因此终结，国际货币体制转换成浮动汇率制度。

刚刚我们讨论了「明治与昭和」的问题。在那个时期，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昭和是明治的反覆」这个想法（一九八八，〈近代日本的言论空间〉，刊载于《海燕》杂志），并且用

明治		昭和	
45年	乃木將軍殉死	45年	三島由紀夫自殺
44年	結束不平等條約	44年	沖繩歸還運動
43年	併吞韓國・暗殺天皇事件	43年	全共鬥運動
37年	日俄戰爭	39年	東京奧運
27年	日清戰爭〔甲午戰爭〕	35年	安部鬥爭・新安安保條約
22年	發布憲法	26年	和談會議・日美安保條約
(10年)	(西南戰爭)	21年	公布新憲法
		(11年)	(二二六事件)

图二的年表来说明：

但是在这个年表里所看到的、明治与昭和相对应的关系，并不是日本特有的现象；而是从根本上，以世界资本主义的周期循环为基础的，长度大概是六十年左右。说到这个，明治加上大正刚好差不多是六十年，所以昭和看起来就象是明治的反覆。

不管谁看了这个年表，都会觉得一九九〇年之后的发展，将走向类似一九三〇年代的路吧。这个预测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准确的。九〇年之后开始有人提倡类似「超越近代」的意识型态，也有人提出「东亚细亚共荣圈」的主张；这些想法之盛行，到了连广松涉【注⁷²】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说类似的话的地步。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细川内阁成立。在此之前日本政坛呈现「自民党—社会党」的结构，恰好与美苏冷战结构对应；细川护熙不但突然崛起于这个二元的框架之外，并且在他手上将这个结构解体。要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那个时候，我注意到某种反覆。细川护熙不但是战前首相近卫文麿的外孙，他当上首相的过程，也和近卫相似。近卫曾经两度担任首相，一九三七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四〇年的日美战争，他都是决定性的推手（战后他被判定为战犯，但在正式受审前自杀身亡）。

⁷² 广松涉广松涉(1933- 94)，哲学家。从少年时期开始从事政治活动，曾参加日本共产党，之后参加全学连的活动，并且脱党。持续地在理论层面支持第一次与第二次 Bund。广松涉以物化论解读马克思、开启新地平线著称，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之地平线》（一九六九，劲草书房）、《马克思主义之成立过程》（一九七四，至诚堂新书）、《马克思主义之理路》（一九八〇，劲草书房），合称马克思主义三部曲。

近卫得到当时所有党派的支持。第一，他出身华族(贵族)，与皇室有很深的渊源；再者，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左翼分子，又是个文人，和右翼、军方也走得很近。事实上，一九四〇年全部的政党都解散，组成「大政翼赞会」，几乎所有的势力都集中到他的脚下。不可思议的是，反对这件事的人，只有少数天皇主义的右翼分子；他们担心他会变成像德川(将军)那样的角色。

这样的近卫，和路易·波拿巴特(拿破仑三世)很像。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时候，波拿巴特除了是拿破仑的姪子，什么也不是。但是过了几年，所有党派、阶层都拥护他，让他得以从总统变成皇帝。他本身曾经是个圣西蒙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者。透过一面维持资本主义，一面设法消除资本主义带来的矛盾和对立，他得到所有阶级的支持。

小岚- 谈到波拿巴特，马克思写过《路易·波拿巴特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柄谷- 是的。关于马克思那本书，我写了一篇很长的解说(〈表象与反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的雾月十八日》之附论。二〇〇八，平凡社 Library 系列)。我之所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那本书，是因为原先对法西斯主义的思考，没有能够真正解明问题所在。一谈到法西斯主义，大部分的人就会联想到控制大众的高压体制，但那是种误解，把法西斯和后进国家的独裁体制混为一谈。法西斯主义其实是透过绝大多数大众的支持而实现的。

还有很多人把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或是军国主义、侵略主义联结在一起。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始祖意大利，既没有反犹太，也没有发动侵略战争。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者佛朗哥(Franci sco Franco)，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保持中立的。另外，一般认为法西斯主义会废除王政、停止议会制，可是日本就没有。也因此有大主张日本从来没有过法西斯主义。

但我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对抗-革命」。换句话说，是采取和社会主义不同的方式，来消除阶级对立的革命，是种透过国族的革命。举例来说，德国作家、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运动败给了法西斯？在他的看法里，法西斯主义试图以新的样貌，来复原遭到资本主义破坏的共同体与古代的社会型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却单单只是对共同体与古代的社会型态采取否定的态度，所以才败给法西斯主义。这个看法如果用交换模式来观察，更容易理解。经由强调国族(互惠式的交换模式)来否定资本主义、否定国家，这就是法西斯主义。

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就知道法西斯主义不是从意大利开始的；举例来说，一八四八年法国的路易·波拿巴特，就已经是法西斯主义者。拿破仑曾把土地发放给小农民，因此身为拿破仑姪子的波拿巴特，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他本身又曾经是圣西蒙派的社会主义者，所以劳工阶级也视他为盟友。不仅如此，因为他主张产业主义，资本家也支持他所有的人都支持他。就这样，他不但选上总统，还当上了皇帝。

波拿巴特的革命，是相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对抗-革命」。和「反革命」不一样，它本身看起来就象是一种革命，所以得到大众的人心。当然，那只是做给人看的外表；骨子里它只不过是为了国家和资本而运作而已。因此，如果要看清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我们必须从「波拿巴特式的政治」，这个更根本的观点来观察。这样一来就会发现，和希特勒同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个波拿巴特主义者。他得到所有党派的支持；虽然身为民主党员，但共和党也支持他。结果，他成功地诱导本来反对参战的美国人民，加入了太平洋战争。

话题再回到日本。我认为近卫是个波拿巴特式的政治家。不仅如此，近卫的姪子【译注：这里应该是柄谷先生口误。是外孙才对】细川也是一样。日本自民党、社会党的体制与美苏冷战结构相呼应，持续了很长时间；

但是细川突然从这种政党政治的框架之外浮上台面，彻底重组了日本政治势力的结构。理解了这一点，除了用波拿巴特主义来看他，很难有别的方式。事实上，世界各国似乎都对于这个情势的演变感到非常惊讶，无法理解。从日本回传到各国的情报，除了称之为日本特殊的现象，都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说明。但是，我听佐藤优【注⁷³】说，当时在外务省工作的他，在与各国知识分子的通信中点出了我的看法，大家好像才终于解除了疑惑。

小岚- 因为这是具有普遍性的认识，所以他们才能理解吧。

柄谷- 总之，近卫的外孙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看起来正是一九三〇年代历史的翻版。不过，两个时代的雷同到此为止。细川护熙很快地失势，再也没有出线。也就是说，一九三〇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再度发生；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就像刚才提过的，新自由主义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曾根政权时期萌芽，一九九〇年代则开始全面进行。

这些过程，怎么看也不像一九三〇年代。日美之间的对立也没有强化。而且，中国和印度不但不再处于一九三〇年代的殖民地状态，更在经济上发展，逐渐成为大国。这和一九三〇年代完全不同。所以，没有办法照这个年表(图二)来思考下去。

其实还有一件令我困扰的事。我虽然没有继续列出来，但照着这个年表延伸下去，一九九九年将会与昭和十六年互相对应【译注：昭和十六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展开】。我曾听到一个谣言，据说奥姆真理教就是因为根据我的年表预测未来，才决定在一九九五年犯下地下铁沙林事件。自此之后，我绝口不再提这个年表的事(后来奥姆教领导人之一的上祐史浩，招认此事并非谣言)。

但是我仍然觉得，历史的反覆性这个观念本身并没有问题。我所犯的错误，是以六十年为周期来思考。一九九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不同之处太多了。这时我想到，或许可以用它的两倍，一百二十年为周期来看。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出一九九〇和一九七〇的相似。一九七〇年的中国和印度虽然遭到西洋列强的侵略，毕竟都还是大国。这一点从日本在一八九四年日清战争【译注：即甲午战争】之前，一直极度惧怕清朝，就可以看出来。

造成日清战争的原因，是朝鲜(李朝)国内的对立；也就是说，朝鲜「亲中派」与「亲日派」的对立导致了战争。日清战争的结果，台湾割让给日本。因此，现在的中国、台湾、南北韩、日本这个东亚结构，

⁷³ 佐藤优 日本的外交官、作家。二〇〇二年五月以渎职罪嫌疑遭逮捕。虽然主张自己无罪，但法院一审判决有罪，二审维持原判，三审二〇〇九年最高法院上诉中【译注：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最高法院仍维持原判】。一审判决后出版《国家的陷阱》(二〇〇五，新潮社)一书。另外有《狱中记》(二〇〇六，岩波书店)、《国家、神与马克思——「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如是说》(二〇〇七，太阳企画出版)、《我的马克思》(二〇〇七，文艺春秋社)等著作。

2 为什么要以一百二十年为周期

小嵐 - 为什么不是六十年，而是一百二十年？

柄谷 -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说明，《易经》也是以六十年为周期。我认为易经是长年累积的经验所产生的普遍认识，对它抱持着兴趣。但是我之所以提出六十年一周期的看法，不是因为易经，而是有别的根据。另外，一百二十年的周期，也有它自己的根据。

有人说，「不了解历史，就会重蹈覆辙」。但是了解了历史，就可以避免历史重演吗？历史的力量只是这种程度的东西吗？所谓历史的反覆性，指的是历史具有重复自己结构的力量。《路易·波拿巴特的雾月十八日》一开头，有一段著名的话：「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史上所有伟大的事件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但是他忘了加上这一句：如果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伟大的悲剧，那么第二次就是惨不忍睹的闹剧。」（平凡社 Library 系列）。我觉得这不只是修辞上的、文字上的游戏。对于历史的反覆，我们必须更为严肃地思考。

我所说的反覆，是结构性的东西。资本主义就具有反覆性的结构，比如景气循环就是如此。恐慌、不景气、景气、恐慌 -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循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透过恐慌与不景气，来进行暴力式的淘汰与整理。因此，这个反覆是强迫性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思考的是大约以十年为周期的景气循环;但是还有更长期的景气循环(波动)。康德拉季耶夫【注⁷⁴】所指出的长期波动,大约是五十到六十年左右;因此就算和易经无关,六十年的周期还是存在的。另外,布劳岱尔【注⁷⁵】指出另一种「长期循环」(cycle),可以说大约是一百二十年左右。只不过他所讲的循环是观察物价的长期变动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所以我想从「世界商品的更替」这个观点,来观察周期性。这个观点,是以宇野弘藏的阶段论为基础的。

长期波动与短期的景气循环虽然在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以我的看法,长期波动是伴随「世界商品的更替」所产生的大规模现象。近代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以世界商品之更替为特征。举例来说,从毛织品工业阶段开始,到棉纺织业、重工业、消费性耐久财,更进一步到信息产业阶段。这种转移,不仅止于技术的层次,而是伴随着整体社会的变化。因此不管有没有金融恐慌,转移的时候必定跟随着长时间的、深层的不景气。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就像图三所显示的,有一个以一百二十年为周期的循环。

但是光从资本主义的景气循环,没办法谈论历史的反覆;因为事实上,国家也有反覆的现象。国家并不只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所决定的上层结构。就如同资本是能动的主体,国家也是能动的主体。资本主义具有反覆的结构,国家也是,虽然两者方式不同。

	1750~1810	1810~1870	1870~1930	1930~1990	1990~
世界資本主義型態	後期重商主義	自由主義	帝國主義	後期資本主義	新自由主義
霸權國家		英國		美國	
傾向	帝國主義式	自由主義式	帝國主義式	自由主義式	帝國主義式
資本形態	商人資本	產業資本	金融資本	國家獨占資本	多國籍資本
世界商品	紡織業	輕工業	重工業	消費性耐久財	IT 產業
國家形態	君主專制	國族國家	帝國主義	福利國家	地域主義

圖 3 近代世界系統的歷史階段

我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的雾月十八日》中,清楚掌握到这个现象的本质。他认为,不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一七八九年革命的反覆,而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古罗马历史事件的重现。他所指的古罗马历史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凯撒遭到暗杀一事。这个问题发生在罗马由城邦(都市国家)转型为帝国的时期。凯撒之所以试图登基为皇帝,就是因为当时罗马的发展日益巨大,早已不是城邦的规模。以城邦原理设立的元老院,反对凯撒的做法,进而暗杀了他。但是,凯撒死后,罗马却成为真正的帝国。当某个国家企图扩展为「帝国」的规模时,就会产生这类的变化。

我想说的是,具有反覆性质的,并非只有经济,国家也有反覆性。国家和资本一样,都是能动的主体;但是这两个能动的主体,都处于强迫性的反覆性结构之中。所以我们在谈论历史的反覆时,必须同时考察国家固有的反覆性,以及资本固有的反覆性。国家与资本处于对立同时又互补的关系,两者都没办法化约成单一元素来看待【译注:用国家来解释资本,或是用资本来解释国家】(图三)。

⁷⁴ 康德拉季耶夫 康德拉季耶夫(1892-1938), 俄国、苏联经济学家。主张资本主义经济以五十到六十年为景气循环周期, 在景气与不景气之间不断反覆。这个主张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

⁷⁵ 布劳岱尔 布劳岱尔(1902- 85), 法国历史学家, 重视历史深层结构的分析, 属于「年鉴学派」一员。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

在这里，我构想了如图三的阶段论。这些阶段，有它们各自的主轴商品，我们大可称之为「世界商品」。主轴商品的变化，构成了每个阶段各自的特征；当然，技术与能源也会随之产生变化。对照之下就可以看出，重商主义阶段的特征是纺织业，自由主义阶段是轻工业，帝国主义阶段是重工业，后期资本主义是消费性耐久财(汽车与电器制品)。一九九〇年代开始，则迈入了新自由主义的阶段(IT产业)。

还有，一般认为从自由主义到帝国主义，是一种阶段性的发展，但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和他们说的意思不同。我的看法得自华勒斯坦【注⁷⁶】。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霸权(Hegemony)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帝国主义则是原有霸权国家没落之后、新的霸权国家尚未确立之前，各国为了抢夺霸权的竞争状态。

在华勒斯坦的想法里，近代世界经济中曾经掌握霸权的，只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还有美国。在英国采取重商主义(保护主义)的十六世纪后半到十七世纪中期，荷兰是个自由主义国家，政治上也采用了共和制，而非君主专制。当时阿姆斯特丹是个特别的城市，不但收容了流亡的笛卡儿与洛克，也让史宾诺莎可以安心居住。还有，在众多国家中，德川幕府只跟荷兰通商。

根据华勒斯坦，一个霸权国家要成立，首先要有优越的制造部门，接着商业与金融部门也必须取得领先的地位。要在这三个领域同时占有优势，非常困难；即使达成了，通常也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这意味着，就算在制造部门失去了领先的地位，只靠商业与金融，仍然有可能维持霸权。举例来说，荷兰和英国就都是这样，在生产方面没落之后，光靠着商业和金融，仍然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霸权。事实上，一九七〇年之后的美国，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所谓「帝国主义时期」，不只是指一八八〇年以后的状态；荷兰没落之后的时代也是如此。而且一八八〇年以后的帝国主义，也不应该用列宁的定义来理解，而必须把它看成是历史在英国失去霸权后的阶段，也就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想要继承英国的地位，开始彼此争夺的时期。依据这个看法，美国在一九三〇年取得霸权之后，历史又进入「自由主义」的阶段。跟着在一九九〇年之后，美国开始没落的阶段，又再度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

就这样，「自由主义」的阶段和「帝国主义」的阶段交互轮替。在我看来，一个阶段的周期大约是六十年。因此我们可以说，近代世界史大概每一百二十年会出现类似的发展。今后是否会继续同样的模式，不得而知；不过我认为对于理解过去的历史，它是个有效的、具启发性的假设。

⁷⁶ 华勒斯坦 华勒斯坦(1930-)，美国社会学家，确立了近代世界系统论。主要著作有《现代世界系统 I & II》、《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

3 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小岚-- 英国转向「帝国主义」，是在一八八〇年代吧。那时候他们占领了埃及。

柄谷-- 是的。马克思刚好在那时候去世，所以他没有目睹英国的帝国主义阶段。当然，他在晚年已经察觉了那个征兆。谈到英国的帝国主义，大部分的人认为是大英帝国强盛到极点的表现，其实正好相反：英国的帝国主义，是大英帝国及其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衰败的证明。

一八七〇年以后，敌不过德国与美国的强力竞争，英国的制造部门衰退下来；于是他们在海外市场以及金融方面找到出路。在英国还握有名符其实之霸权的时候，不仅一般国民的福祉受到照顾，劳动者的处境也很好。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这些都失去了。一旦转型为帝国主义，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了「自由主义」，获得支配性的力量；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进化论(spencer)【注⁷⁷】，是把达尔文的天择说(弱肉强食)套用到社会上的产物，他们称之为「帝国主义」。在当时，这样的思想是受到正面评价的，甚至连吉卜龄(K. P. Hng) 这样的诗人都对它加以赞扬。

一九九〇年代，「新自由主义」【注⁷⁸】的意识形态取得支配性的地位。但是，它和「自由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实上它与过去的帝国主义是一样的东西。举例来说，当时「胜者集团与败者集团」、「自我责任」等等傲慢的语言横行一时，这完全是社会进化论的翻版。

如果说自由主义，是指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霸权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政，那么就可以看得很明白：美国的自由主义只到一九七〇年为止。美元的金本位制度之废除，显示了美国的经济，从一九七〇年代就开始走下坡。这和从前荷兰与英国所走过的，是一样的路。也就是说，虽然制造部门没落了，但是在金融与商业方面(石油、谷类、能源资源等等)，仍然掌有霸权。

英国在它的自由主义时代，因为握有绝对的优势，并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战争威胁。美国的自由主义时期(如同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可以从一九三〇年算起，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为止；特别是其中的一九四五到一九七五年。这段时期，先进资本主义诸国都在美国的保护下，同时因为有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各国都能彼此协力合作，并且在国内实施保护劳动者与社会福利的政策。与敌对的表象相反，对世界资本主义来说，国际上的苏联势力与国内的社会主义政党不但不是一种威胁，反而是一种安定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说，因为有美国这个霸权国家，冷战时代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阶段。

与此相对的，一九八〇年代先进资本主义诸国，开始大张旗鼓地削减社会福利、降低对资本的课税与限制，施行「里根——撒切尔主义」式的政策；这就是通称的新自由主义。但是，它和一八八〇年代的帝国主义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列宁曾指出，「资本的输出」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特征之一。当资本在国内市场无法存续的时候，就会向外发展，寻求全球市场。汉娜·鄂兰则将一八八〇年代显著化的帝国主义，描述为「国家—资本」从国族(国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状态(《极权主义的起源 2》，大岛通义与大岛 Kacri 译，一九七二年，M susu 书房出版)。换句话说，国家不顾国族的需求，遗弃本国的劳动者，为朝向海外发展的资本，提供制度上与军事上的支援。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是同样的状态。

⁷⁷ 史宾塞 史宾塞 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主张社会进化论。

⁷⁸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市场原理主义的一种经济思想，以及基于这种思想的政策体系，包括政府对市场的放任、民营化、竞争原理之彻底化、劳动者保护之废除等等。八〇年代美国里根政权以及英国撒切尔政权积极采用，日本的中曾根政权、小泉政权也随之推行。

所谓的「全球化」，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因为先进国的利润低下、慢性不景气等等危机而开始的。原因之一是消费性耐久财的普及，造成原有市场的饱和。另一个原因是在消费性耐久财的生产方面，日本与德急速发展，使得美国失去它独霸的地位。因此美国的资本，试图在全球化的自由竞争中找到活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借助美国在军事上的霸权。所以，现今资本主义的阶段，与其称为「新自由主义」，其实应该称为「新帝国主义」更为恰当。

有些意见认为，美国失去霸权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也有人认为将会是东亚地区；我不这么想。说不定接下来，再也无法出现像过去那种霸权国家。近代世界系统的循环，是因为产业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如果从「世界商品的交替」这个观点来看，找不到任何可能的后继商品。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信息产业，但事实上产业资本主义若要继续下去，除了在后进国寻找生产并消费「消费性耐久财」的人口，别无他法。实际上，如果中国或印度的农业人口比例变得和日本一样的话，世界资本主义大概就没办法成立了。所以，不要说接下来的霸权会不会出现，连资本主义本身都可能走到它的终点。

话虽如此，在那之前，我想世界各国为了抢夺霸权，大概会发生惨烈的斗争吧。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并不是下一个霸权国家将会落在何处，而是如果我们以成为霸权为目标，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毋须赘言，就是战争。

小岚——现在世界正面临信用恐慌，许多人企图从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以及其后发生的问题去作比较性的思考。您觉得如何？

柄谷——从信用恐慌走向全面不景气，在这一点上当然是很相似的。但是比起恐慌本身，更严重的是之后的慢性不景气。会发生信用恐慌，是理所当然的事。明明没有实体，硬是勉强做出信用来，这样欺瞒下去，迟早一定会露出无法弥补的破绽。这种不证自明的道理，经济学者们竟然会不懂，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小时候，有人教我在水上走路的方法，就是在右脚还没掉下去之前，把左脚抬起来，然后在左脚掉下去之前，把右脚抬起来。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没有担保的金融想要规避风险，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重要的不是恐慌，而是恐慌将带来的现实上的结果，也就是慢性不景气。

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年代以后，也有过长期的慢性不景气。那一次的慢性不景气是如此地致命，以至于需要两次的大战，景气才能完全回复。

现在的情势和一九二九年类似，这一点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但是用它来作类推思考，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不对的。第一点，一九三〇年代美国明确地取代英国、掌握霸权。但现在是美利坚帝国的没落期，而且此事无法避免。当然，如同大英帝国在进入没落期之后，透过其帝国主义式的行动，还维持了强盛的表相，我认为今后美国也会持续在军事上采取帝国主义式的做法，不过它已经不可能像以前一样握有全面的霸权，顶多只能维持一个单一的帝国吧。

第二点，一九二九年那个时间点，世界商品正转移到汽车、电器制品等等消费性耐久财；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就从那时候开始。在这个情况下，尽管不景气再怎么深沉，对于未来还是有所展望。所以才会有凯恩斯主义【注⁷⁹】且那种透过公共投资、强行刺激消费的政策。

⁷⁹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 (1883- 1946) ，英国经济学家、投资家。在英国经济没落的背景下，为了让处于危机的资本主义体制能够存活下来，凯恩斯提出总体经济学，主张由国家介入经济，以创造有效需求。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成为近代经济学的经典。虽然三〇年代美国的新政就是以凯恩斯经济政策为理论基础，但是其全面的采用与推行要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久以来，凯恩斯主义一直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政策。

但是在今后的慢性不景气里，不再有那种可能性。目前在先进国内，汽车、电器制品等等消费性耐久财已经饱和，只能仰赖中国与印度的市场。一九九〇年以后，IT产业以关键产业的姿态兴起，似乎带来崭新的世界资本主义之希望；但是IT产业会减低人力的需求，因此消费也会降低。慢性不景气是无法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执行凯因斯主义的公共政策，也不会产生效果。事实上在一九三〇年代，凯因斯主义的公共政策(新政〔New Deal〕)也是无效的；真正产生效果的，是军需，换句话说就是战争。美国克服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是在日美战争爆发之后的事情。

今后的慢性不景气，应该和一八九〇年代之后的慢性不景气比较。它起源于一八六〇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商品转移到重工业而开始。大英帝国的基础是纺织工业；换句话说，是轻工业。像炼铁制钢这种重工业，需要国家的投资；光靠股份的方式来集中资本，是不够的。相反地，德国与日本则是以国家的力量来进行重工业的发展。因此，英国就在这个点上开始没落。

但是重工业的投资在设备方面占比很高，相对地所需要的劳工又不像纺织业那么多；结果造成利润普遍低下，慢性不景气持续。为了脱离不景气，国家与资本试图确保海外的市场与资源，开始互相争夺，那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当帝国主义战争以世界级的规模发生的时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如此，但是先前发生在东亚的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早就已经是「帝国主义战争」了。

有的人主张资本主义已经终结，也有人说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极限，但是我觉得这些看法很愚蠢。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主义」。资本只有在透过 $M - C - M$ 这个过程自我增殖的时候，才是资本。为了自我增殖，一定要找到价值体系的差异(剩余价值)。资本无论如何，都会设法找出剩余价值。国家也是一样，不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定会去寻找差异。因此，不要说资本主义的终结了，激烈的斗争从此才正要展开。当然，想要靠绿色(环保)产业这样的东西来脱离慢性不景气，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最后的手段就只有战争一途。

4 帝国与帝国主义

小岚 - 纳格利和哈德在《帝国》一书中写到,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而已经成为「帝国」了。

柄谷 - 一九九一年波斯湾战争的时候,美国虽然握有绝对的军事霸权,仍然求得联合国的支持才出兵;所以纳格利和哈德从这一点认为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而将美国比喻为罗马帝国。据说看到了这样的说法,美国的国务院非常高兴。不用说,十年后的伊拉克战争,证明了这个看法是错的。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国不要说是征求联合国支持了,根本就公然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走上「单独行动主义」之路。

当然,纳格利和哈德大概不会拘泥于「美国是帝国」这个意见吧。应该说,在他们的看法里,「帝国」并不是一个有形的场所;他们所谓的「帝国」,指的是「资本的帝国」,是「世界市场」的别名。但是,不管是关于资本或国家,这个看法都太过单纯。他们只考虑到单一资本,单一国家。如果不考虑资本之间的竞争,就不会了解资本主义经济。

有关国家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只从一个国家的内部去观察,是不会了解「国家」的。在现实中,资本和其他的资本相互竞争,国家也是相对于其他的国家而存在。即使是包含多个国家的「世界=帝国」,也是一样。「世界=帝国」之外,还有别的「世界=帝国」。罗马帝国时代亦是如此。举例来说,同时代在中国还有「汉」这个大帝国。所谓「世界=帝国」,顶多只不过是一个经济圈;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近代的世界市场,虽然接续着这样的「世界=帝国」的情况,却已经无所不包,没有「外部」了。但是,这样的世界市场是由许多的资、许多的国家或帝国所组成。单一的「帝国」这种东西,只存在于理论之中。以《资本论》为例,从第一卷到第二卷,一直只讨论单一的资本;可是到了第三卷,就出现了多数资本的讨论。我想纳格利大概没有读第三卷吧。他完全没有提及关于信用的问题。

小岚 - 纳格利与哈德的观点,很接近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里的认识;认为在世界市场的「普遍交通【注⁸⁰】」下,民族与国家的差异将消失。在这个状况下,无产阶级将发起对资本的反叛,那就是世界同时革命。纳格利只不过是把无产阶级代换 **Multitude** 诸众(异质、多样的民众)【注⁸¹】这个概念而已。

柄谷 - 没错。纳格利与哈德之所以引进 **Multitude** 这个概念来作为革命的主体,就因为它的意义比「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来得广泛。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不把盖达组织,或类似的伊斯兰运动,也视为 **Multitude** 的反叛呢?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既然这样,还不如继续用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原本大家使用「无产阶级」这个词语的时候,向来就有比它字面上更广泛的意义。

⁸⁰ 普遍交通广义的交通泛指人、物质、以及信息等等在空间中的移动与交换。除了我们日常的理解,还包含沟通的意思

⁸¹ **Multitude** (诸众) 马基维利与史宾诺莎都使用过这个政治概念。最近因为纳格利与哈德的「帝国论」,这个概念再度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拉丁文中,这个 **Multitude** 概念包含了「多数」、「群众」等意义。纳格利与哈德寄望 **Multitude** 可以取得权力、建立跨越国境的网络,让民主主义得以全球性的规模实现。

我认为纳格利等人的看法之所以和《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相似,因为他们属于六八年的思想家。一九六八年距离一八四八年,刚好是一百二十年。举例来说,华勒斯坦主张一九六八年的革命足以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匹敌,是世界规模的革命。在他的看法里,六八年的世界革命,与其说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力,还不如说是更为根本的反体系运动,也因此它的影响更为广泛。在这一点上,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也有一样的特性。虽然以政治权力的角度来看,它是失败的,但是革命的结果带来各国的普选、以及工会的合法化,并且迈向社会福利政策。华勒斯坦认为一九六八年的革命,让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曾经有过,后来遭到压制的、包含早期马克思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复活过来。

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一八四八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要说消泯民族与国家的界线了;在法国和普鲁士,透过波拿巴特与俾斯麦之手,它带来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就是四八年革命的答案。只有这场战争之后所诞生的巴黎公社,算是四八年革命最后燃起的一把火吧。

一九六八年之后也是一样的情形。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公然进入「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情势,纳格利与哈德表示世界同时革命就要开始,呼吁大家再度拾起六八年的精神。他们的理由是「全球化」让民族国家这个框架失去了意义,各国的 **Multitude** 同时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我认为这个判断完全错误。

的确,在帝国主义时代,国族(**Nation**)的要素遭到割离。举例来说,资本舍弃本国的劳动者,转向他国,弃人民的福祉于不顾。但是「国家」绝对不会因此消除;相反地,国家与资本正是为了和其他的国家或资本竞争,才会实施这种政策。另外像欧盟(**Eu**),限制了各个国家主权,将它们联合起来。不过,这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力量。事实上近代主权国家的概念,只适用于少数的大国;其他绝大部分的国家,都从属于大国。自古以来,「国家」只要是为了存续,不管是联合或是从属,什么形态都可以接受。

欧盟的理论家们,主张欧盟超越了近代主权国家的概念。但是,如果说国民国家是「世界经济」制约下的产物,地域性的国家共同体也是一样的。欧洲诸国为了对抗美国与日本,组成了欧盟,将经济与军事的主权让渡给更上层的组织,这绝对谈不上是近代国家的扬弃。这只不过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压力下,结束原有的各个小国家,结合成「广域国家」而已。

这种广域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一九三〇年代德国构想的「第三帝国」、日本构想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它的先驱。这两个构想,都是为了对抗当时英、美、法的封锁经济而产生的。不但如此,在那个时期的这种广域国家,被视为超越了「近代世界系统」,也就是超越了资本主义、或是[**Nation = State**]的东西。但其实在西欧,这种想要组织「欧洲联邦」的意图,从拿破仑以前就有了;它的理念根据,与自古以来的「帝国」其实是一样的。

不用说,那些企图实现「欧洲联邦」的努力,结果只是变成法国或是德国的「帝国主义」。今日,在这欧盟形成的当下,欧洲人并没有忘记过去历史的教训;他们想要实现「非帝国主义」的「帝国」,这个理想是清楚可见的。尽管如此,再怎么讲,它顶多只能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广域国家」。

其他的地区，也正进行同样的发展；比较显著的是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俄罗斯等等，那些过去被近代世界系统边缘化的古代「世界帝国」们，再度登上世界舞台。不管哪个地区的国族国家，都是从古代世界帝国独立出来的；一方面它们拥有共通的「文明」，另一方面又有过去分裂与抗争的、活生生的记忆。但是，如果说各个国家或国族，愿意把各自的记忆「置入括号」，大幅度地限制自己的主权而形成共同，那是因为对它们来说，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更有切肤之痛。雷南(Renan)【注⁸²】曾经这样说，为了形成国族(Nation)，我们必须忘记历史。同样的话也可以拿来描述广域国家的形成。换句话说，这些都只不过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或是「创造出来的共同体」而已。

小岚- 这种世界分割，会不会为今后带来过去封锁经济的争霸现象？

柄谷- 我觉得会。我认为各个「国家=资本」，为了抢夺能源；将发生炽烈的斗争，而且也会出现为斗争服务的意识形态。各国在它们内部或许会形成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但对外将采取保护主义。不是以国为单位的保护主义，而是以 **blocc**(经济圈)为单位的保护主义。十九世纪末，同样的这些趋势最后成为帝国主义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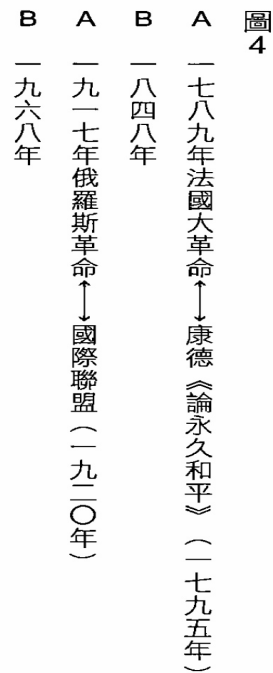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现在和一九三〇年代有决定性的不同，那就是这一次「帝国」间的竞争，将有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等帝国的参加。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俄罗斯。这些帝国在十八世纪以前，都曾经比欧洲强盛优越，所以对于它们的再度登场，我们也毋须惊讶。

⁸² 雷南(1823- 92)，法国宗教史家、思想家。主要著作《耶稣传》(一八七一)，将无法以自然科学进行理论化、体系化的要素，全部当作迷信予以排除，成为以世俗观点研究圣经的肇始者。

5 革命与和平

小嵐- - 嗯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柄谷- - 刚刚我们谈论了资本与国家的反覆性，但是反过来说，对抗资本与国家的运动，也与之相应，而具有其反覆性。就像刚刚说过的，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后过了一百二十年，有一九六八年的革命；这段时间中发生了俄罗斯革命（一九〇五年与一九一七年）。另外一八四



八年的六十年前，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如同图四所示：

举例来说，华勒斯坦把一八四八年的世界革命看作是一七八九年的扬弃，更进一步把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大革命看作是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扬弃，把一九六八年的世界革命看成是一九一七年的扬弃。但是，仅仅把这些事件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来看，并没有什么建设性。A系列（一七八九、一九一七年）发生在「帝国主义」的阶段，B系列（一八四八、一九六八年）发生在「自由主义」的阶段。了解这些差异与反覆性，对于展望一九九〇年之后的未来，十分重要。

首先从 B 系列来观察。这两次革命都发生在英国或美国握有霸权的「自由主义」阶段，都是与资本对抗的运动，而且规模巨大；但是这两次革命一开始就完全没有取得国家权力的意图，以这一点来说，可以算是彻底的失败。不过，它们的意义存在于别的地方。

一八四八年，无产阶级在各地同时起义，迫使各国的「国家—资本」不得不实施社会主义式的政策。一言以蔽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催生了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雏型。因此一八七〇年以后的「帝国主义」，应该看作是将「国家—资本」从国族(Nation)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东西。

至于一九六八年的革命，其斗争的主体并不是狭义的劳动者阶级，而是学生，或是在性别、民族、人种、性倾向等方面，受到歧视的人。以纳格利与哈德的话来说，这是一场 Multitude 的反叛。革命的结果，使得各国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施行得更为彻底。所以一九八〇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也就意味着「国家—资本」的卷土重来——从国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接下来让我们观察 A 系列, 就可以明白下列的事情。一七八九年的革命, 发生在英国与法国争夺霸权的「帝国主义」时期。法国革命带来的战争, 让法国成为足以和英国对抗的「帝国」; 另一方面,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是第一次大战的结果, 它本身又进一步带来新的战争。俄罗斯革命的结果, 让列强中原本体质最弱的战败国俄罗斯, 以「帝国」的姿态复兴。

在各地的古代世界帝国纷纷瓦解的时候, 唯一能够提供意识形态、阻止帝国分解成国族国家(Nation-State) 的, 只有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他们重视阶级问题胜于国族的问题。甚至连卢森堡【注⁸³】也曾经主张, 只要能解决阶级问题, 民族问题就会自然消失。

小岚- 原来如此。俄罗斯革命并没有让帝国解体, 而是让它更新。这样说来, 中国革命也是一样吗?

柄谷- 的确可以这样说。即使现在也是一样, 如果否定了共产党独裁, 以及毛泽东这个象征(Symbol), 我认为中国将分裂为多个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只以资本主义为标的, 没有考虑到「国家」的问题; 因此他们没有警觉到马克思主义本身, 反而是扮演了重建「帝国」的角色。

根据华勒斯坦的观点, 苏联圈是「世界=帝国」; 换句话说, 是透过「国家」管理「再分配」的机构。魏特夫格(Wittfogel)【译注⁸⁴】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屈从于亚细亚式专制国家传统的结果, 但我不这么想。我认为毋宁说, 只有马克思主义, 能够提供足以重建「世界=帝国」的意识形态。

回到原来的话题, 以对抗国家与资本的观点来看, B 系列比 A 系列重要。但是如果因此就希望今后会出现 B 系列的革命, 我们的期待将会落空; 因为一九九〇年以后属于「帝国主义」阶段, 如果真的发生革命, 也将会属于 A 系列。

华勒斯坦把一九六八年的革命看作是世界规模反系统运动的彩排; 换句话说, 他认为今后, 如同一九六八年那样的革命, 将会大规模重现。如同刚刚提过的, 这个看法和纳格利与哈德如出辙。但是在「帝国主义」阶段, 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世界各地的运动将会分割成离散的状态。

如果我们要思考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九〇年以及之后的历史, 就必须参照一百二十年前, 也就是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〇年, 以及其后的历史。就如同一八七〇年以后的世界无法再现一八四八年, 我们很难期待一九九〇年以后的世界能够重现一九六八年。一九九〇年之后为了争夺资源与市场, 「国家- 资本」间的相互对立将会愈演愈烈, 很有可能引发世界战争。当然, 这场战争的结果或许会带来 Multitude 的起义, 但也可能正好相反: Multitude 的起义说不定会导致战争。不论如何, 身处二十一世纪前半叶, 如果有意从事对抗「国家- 资本」的运动, 必须把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放在心中。

小岚- 在图四里, 出现了康德的名字。《论永久和平》(一七九五年) 出版于法国革命之后。

⁸³ 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1871, 1919), 出生于波兰、活跃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哲学家、革命家。曾参加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 之后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有很深的渊源。以革命组织 Spartakusbund (斯巴达克团) 为母体, 创立了德国共产党。一九一九年一月在柏林领导了武装革命, 与数百名同伴一起被国防军与自由军团(民兵)逮捕, 并且遭到残杀。卢森堡以及同样遭到残杀的盟友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 成为革命的象征。日本曾出版《罗莎卢森堡选集》。

⁸⁴ 魏特夫格 魏特夫格(1896- 1988), 德裔美国剧作家、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原本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活跃的德国共产党员, 二次大战后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

柄谷- 没错。由于预感到帝国主义战争，将会随着法国革命而开始，于一七九五年出版。一般所说的和平，指的是没有战争的状态；但是康德所说的「和平」，是指「所有的敌意尽皆消失」。这意味着「国家不再存在，或者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译注⁸⁵」全面终结。也就是说，康德的「和平」意味着扬弃所有的国家。因此，康德所说的「目的之国」或者「世界共和国」，代表扬弃了国家与资本的社会。

在这个意义下，也许可以说康德的思想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但是他和一般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康德看清了国家是相对于其他的国家而存在。康德的思想就从这个认识出发。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只从国家的内部来思考国家的扬弃，这个想法和他们把「国家」看成是次要的上层结构，有紧密的关系。但是，这一点值得一再重复强调：国家永远是相对于其他的国家而存在，也因此是具有自律性的存在体。如果我们在一国之内兴起革命，废除了国家，立刻就会引起他国的干涉与入侵。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灭亡的。另一方面，俄罗斯的苏维埃在防卫他国侵略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强力的国家。到了斯大林手上，「国家」已经变成恒久不灭了。

康德认识到国家这样的本质，并且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思考国家的扬弃如何成立。他所提出的国际联邦的构想，只不过是迈向「世界共和国」这个「统整的理念」之第一步。虽然黑格尔嘲笑这个是非现实的理想论，但是对康德来说，这是个很实际的提案。事实上，康德认为促使国际联邦实现的，将不会是人类的理性与善意，而是人类的反社会性(敌对性)，也就是战争。这一点与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恶智」不同；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自然的恶智」。

事实上康德的构想一直受到忽视，一直到了十九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才又引起注意。这绝非偶然，因为康德的构想本身就诞生于「帝国主义」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联盟，就是这个构想的实现。虽然因为同时期的俄罗斯革命过于醒目，国际联盟没有受到太多重视，但是将来大家一定会明白，这是人类史上无比重要的个事件。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提倡国际联盟的大国美国，在国内得不到国会支持因而没有参加，导致国际联盟没有实质的力量，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是二次大战的结果，却带来联合国的实现。联合国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现在的评价也不好。

但是重要的不是现实上的联合国，而是「世界共和国」这个「统整的理念」。我认为那些否定联合国的行动，最终将倒过头来强化联合国的力量。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战争，我认为将会带来某种比联合国更好的国际联邦。

小岚- 您是说世界战争反而会带来希望吗？

柄谷- 不！我们当然不可以期待战争；我们一定要阻止战争的发生。事实上如果没有阻止战争的运动即使发生战争，战后也不会有任何东西产生。只不过每次我只要谈到世界共和国之类的理念，就会有人讥为天真、不切实际的梦想等等，我说这些话是想要吓吓他们(笑)。如果没有国际联邦，就会发生战争；可是，一旦发生战争，就一定会形成国际联邦。不管走哪一条路，国际联邦是一定会实现的。

⁸⁵ 霍布斯 霍布斯(1588- 1679)，英国哲学家、近代政治思想奠基者。霍布斯认为，基于生物自我保护的本能，人类的「自然状态」是斗争的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后来变成支持战争的力量。相对于此，列宁主张「由帝国主义战争走向革命」【注⁸⁶】；事实上战败的俄国确实起了革命(第二次)。日俄战争之后也是一样，兴起了俄国的第一次革命。但是那些企图阻止国家参战的反战运动，远比趁着国家凋败的时候攫取权力的革命，更具有革命性，也更合乎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家战败时所兴起的革命，结果只能带来「国家」的再兴。

另一方面，阻止国家的战争行为，几乎就等于是「国家」的扬弃。「世界同时革命」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但是，组成国际联邦来阻止各国间的战争、限制各国的军事主权，可以说就是渐进式的世界同时革命。当然，如果我们放任「国家」为所欲为，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如果要牵制「国家」，「社会」就必须强大到足以与「国家」抗衡。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意思。

⁸⁶ 「由帝国主义战争走向革命」列宁(1870-1924)以他的「帝国主义论」为基础，提出「由帝国主义战争走向革命」的口号，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命题。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论》(一九一六)一书中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说明了资本主义将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入金融资本独占的阶段，列强诸国间发生战争是必然的。同时，列宁从历史发展的位置来看，主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列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战争，交战国的任何一方都是帝国主义强盗，不应给予任何支持；从革命的观点希望自己国家(俄国)的政府战败(革命性的祖国败北主义)

6 如何因应日本的状况

小岚- 请柄谷先生简要地谈一下，您所说的社会主义。

柄谷- 一九九〇年以后，资本与国家牺牲掉国族的福祉，以图继续运作，这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虽然现在新自由主义出现了破绽，但资本与国家并不会因此终结。以目前的社会结构来说，资本==国族==国家，所以终究还是会找回平衡。结果，最后人民将会冀求透过国家，来解决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阶级落差、以及慢性不景气等问题。

我将这种情况，通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当「社会主义」的理念还能扮演指引的角色时(统整的理念)就还好，但绝大部分的「社会民主主义」最后都会演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对外则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所以我认为，可以说资本=国族=国家这样的结构，将会透过「社会民主主义」存续下去。

小岚- 二〇〇〇年 NAM 成立的时候，曾经讨论过生产者协同组织与 地方货币的构想。现在看起来，这是很实际的诉求。

柄谷- 在慢性不景气的时候，人民会寻求国家的援助或介入;某种意义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我觉得这违背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之方向。事实上这是国家资本主义，会变成不顾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欧巴马总统应该也会走上这条路吧。

相对于此，我呼吁创造 *Association* 经济;不要依赖国家，并且避开资本主义式的竞争。实际的内容有「生产者=消费者」协同组织、*Workers- Collective*【注⁸⁷】式的企业、还有地方货币与地方金融等等。比起二〇〇〇年，现在这些构想毫无疑问地更合乎现实。但是在日本，我认为还有别的问题。

日本所欠缺的，是「社会」的力量。如果「社会」不够强而有力，社会主义是不能成立的。

我所构想的是普遍性的理论，并不限定在日本。在 NAM 运动开始以前，我就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日本没有 *Association* 的传统。在有这种传统的地方,和在没有这种传统的地方从事 *Association* 运动，是不一样的。

我在八〇年代谈到「个体」这个概念;我指的是足以与共同体对抗的个人。所谓的个体，并不是私人领域中的个人，也不是疏离的、「原子化」的个人，而是有能力与别人一起合作、共同负责的个人。施蒂纳所说的「个体」，也是同样的意思。由这样的个体所创造出来的共同体，就是 *Association*。

小岚- 请再深入谈一谈，您对于「个体」与其他各种「共同体」的想法。

柄谷- 所谓的个体，并不是背离共同体，闭锁在自我内部的个人;但是大多数人的确是这样看，文学里的个体经常是这种形象。这也不一定就是坏事。紧密依附在共同体之中生存的个人，不可能成为个体。从来没有离开过共同体的个人，不会有能力和他人一起合作、共同负责。我想就因为这样，过去倾向于强调这种孤立的面相。

不过，一九九〇年代，我开始注意到，这种强调「个体」孤立面的看法，渐渐失去它的作用。因为在那之前曾经有过的、各式各样的共同体与中间团体，从总评开始，一直到创价学会、部落解放同盟，一起遭到解体，像牙齿被拔光一样。企业也早已不是终身雇用制的共同体。共同体在各自的场所与领域里，消灭殆尽。

⁸⁷ *Workers- Collective* 是十九世纪欧美产业革命时期诞生的一种劳动者协同组合，提倡由劳动者共同出资，各自以企业所有人的身分，平等地工作。日本在战前虽然也曾有过相同的尝试，一九八〇年代之后活动才更进一步地推广开来。目前关于高龄者的雇用、看护、育幼、设立身心障碍者的工作场所等等，诞生了各式各样的事业协同组合。

那么,「个人」产生了什么变化?共同体消失的同时,相对于共同体,特立独行的个人也不见了;只剩下封闭于私人领域、「原子化」的个人。这样的个人,不会出现在公共领域。当然,选举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投票,平常也可能投书社群网络发表意见,但是举例来说,透过街头示威表达意见这种事,他们不愿意做。在欧美、甚至邻近的韩国,示威活动很多;但是在日本没有。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除了冲绳,日本几乎没有任何示威活动。

因为这个现象,使我思考了很多事情。我觉察到,所谓的「个人」,必须在特定的集团中养成。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形成「个人」的是什么样的集团,这一点很重要。

举例来说,宫崎学【注⁸⁸】也在《法与规——值得信任的只有「咱」和「咱们」!》(二〇〇五, 洋泉社)一书中,提到「个别社会」这个概念。在社会学里,将社会区分成部分社会与全体社会;宫崎学特别将部分社会称为个别社会。他认为所谓的部分社会,并不是构成全体的一部分,而是从全体社会独立出来,并且与之对抗;宫崎学称这样的部分社会为个别社会。政治学上也有「中间团体」或「中间势力」这样的概念,指的是习俗或村落等等,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确实存在的各种集团之象征。中间团体、中间势力等概念,来自孟德斯鸠;宫崎学所说的个别社会,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宫崎学在他一己的认识里,以「法」与「规」的观点,来区分全体社会与个别社会。

举例来说,不论是村落的共同体也好、或是宫崎学所说的帮派组织也好,个别社会的成员之间有一些共同的规范;宫崎学称之为「规」。「规」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也没有罚则,但是很少有人会去违反它。因为做了「规」所禁止的事情,会遭到「村八分」【注⁸⁹】

另一方面,「法」则存在于个别社会之外,成立于「规」不能发挥效用的地方。像国族国家这种抽象的「全体社会」,所共有的规范不是「规」,而是「法」。举例来说,在家庭中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暴力事件,很少人会去报警;大家总会想办法在家庭中解决,或是寻求亲戚朋友的帮助。然后,如果这样做还是不能解决,才会找警察来;换句话说,这时候「法」就登场了。虽然两者都是共同的规范,但个别社会的「规」,和全体社会的「法」是不同的。

不过根据宫崎学的看法,在日本,拥有自己的「规」、足以自治的个别社会太少,因此在日本社会中这样的区分很难成立。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日本过去在封建时代曾经有过的、自治的个别社会,从明治时代以降,遭到全面解体,所有的人都被全体社会吸收;这个转变使得日本得以急速地近代化。相对地,欧洲的近代化则是在自治都市、协同组织(工会)、同业公会、以及其他 Association 逐渐强化的同时,渐进地发生。欧洲所谓的「社会」,是由这样的个别社会所组成的网络。这样的「社会」和国家有所区别,是理所当然的事。

相反地,因为日本的个别社会力量薄弱,「社会」就等同于国家。然后宫崎学认为支配日本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法」,而是实体不明的「世间」【译注⁹⁰】。因为具有自治能力的个别社会解体了,让国族国家与产业资本主义得以成功地急速形成;但是面对现在的情况以及全球化的趋势,这样的社会结构却不再是有利的条件。

⁸⁸ 宫崎学 宫崎学(1945-),评论家、纪实文学作家、小说家。著作有《突破者》【译注:关西方言,指离经叛道决断力强,以超乎常理方式解决事情的人】(一九九八,幻冬社)、《不逞者》【译注:刁民,不服从的人】(一九九九,幻冬社)、《近代日本帮派肯定论——山口组的九十年》(二〇〇七,筑摩书房)等等。

⁸⁹ 「村八分」「村八分」是日本自江户时代以来,一种民间私下制裁的方式。违反村落规范的人,村民全员联合起来,与该户人家绝交。后来引伸为驱离出团体、同伴之外的处罚方式。

⁹⁰ 「世间」根据译者的理解,宫崎学所说的「世间」的意思,是「匿名的多数人之意见」。因为匿名,所以不用负责。

与日本的情况不同，中国的个别社会力量非常强大；因为个别社会——帮派与亲族组织——的强大，妨碍了「国民」(Nation)的形成，也因此中国的近代化脚步缓慢。但是中国拥有跨越国界的个别社会之网络，面对今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反而成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日本因为缺乏这样的网络，逐渐变成是一种弱点。这是宫崎学的观察。

我赞成这样的看法，但这个看法和之前丸山真男的说法其实是一样的。丸山真男没有使用个别社会这个词语；他借用孟德斯鸠「中间势力」的概念，但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关于这点我等一下再说明；现在我想指出的是，丸山真男一向被视为近代主义者、市民主义者，而且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但是，丸山真男的主张，并不一定是「进步主义」的。

举例来说，丸山认为创造西洋「学术自由」传统的，并不是进步主义者，而是古老势力、中间势力。因为教会抵抗、阻止国家掌握教育的权利，学术的自由才得以成立。但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国家很轻易地就掌握了教育权；之所以如此，起因于德川体制下，佛教团体只是单纯的行政机关。根据这样的观察，丸山真男认为日本快速近代化的秘密，就在于封建的、讲求身分的中间势力，抗衡的力量脆弱。换句话说，如果中间团体软弱，个人也就没有力量。

之前也提过，一九九〇年代日本国内的中间势力、中间团体尽皆消失。国劳、创价学会、部落解放同盟，拥有教授自治团体的大学也是如此。这些中间势力是怎么被消灭的呢？众多媒体像被动员起来的宣传活动一样，异口同声地一致责难这些中间团体为封建式、非理性的、没有效率，指称它们会使日本失去国际竞争力，将它们贬为「守旧势力」(以小泉的话来说)。要辩驳这些非难并不容易。实际上，大学教授协会抱残守缺、老旧不堪；国铁的服务质量低下、为人诟病；解放同盟性喜内斗，恶名在外。这些团体的确有值得批判的地方，想要为它们辩护，非常困难。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所谓的中间势力，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东西。比方孟德斯鸠认为保障民主主义的中间势力是贵族与教会，但这两者都非常腐败。因此法国革命的时候，这些势力轻易地就遭到扫除。即使想要支持这样的中间势力，也很难找到立场。所以当它们受到一致的非难，立刻就瓦解。但是这带来的结果，却是足以抵抗专制的集团消失了。

小岚——请您分析一下日本的中间势力。

柄谷——日本的中间势力在二〇〇〇年，几乎完全消失。小泉政权就在这时候出现，社会上已经没有足以抗衡的力量。小泉把残存的中间势力称为「守旧势力」，趁机一扫而空。刚才我们也讲到，孟德斯鸠曾说过，没有中间势力的社会将会变成专制国家；在这个意义下，我认为日本已经变成专制社会。怎么看出来呢？举一个例子来说，日本没有示威游行。

现代的专制社会，并不是专制君主或是军事独裁所支配的社会，也不是极权主义。和那样的专制国家比较起来，日本拥有国民主权的体制，是一个代议制民主主义的国家。那么，为什么说日本是专制国家呢？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思考代议制民主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一般的说法，所谓代议制民主主义，是指国民可以透过总选举，遂行立法与行政的权利。但实际上的情况如何呢？

在代议制之下，每个人都可以投票。但是在投票的时候，个人从具体的个别社会里被抽离出来，成为「抽象的」个人。投票者单独处于密室般隔离的空间中，在选票上圈选候选人；个人和他人没有接触。那么，所谓拥有主权的国民，到底在哪里？在代议制底下，国民只能以「支持率」的形态存在；只能被当作统计学上的数字来处理，有如「幽灵」一般。比方说，支配电视界的力量，是「收视率」；但到底是什么人在看电视呢？没有人知道。重要的只是统计学上的数值而已。

国民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只是一种说词；事实上明确的个人并不存在。就如同收视率一样，实际上存在的只是实体不明的支持率而已。我们只能在强加给我们的候选人或是政党中做出选择；但是这样能算是政治参与吗？个人所能做的，只是选出代表者。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代议制是贵族政治，甚至是寡头政治；真正民主主义的本质，只能透过抽签来实现。换句话说，只有在行政上拥有平等的实际权利，才是民主政治。

在今天，代议制实际上是贵族政治这个事实，已经非常露骨明显。举例来说，日本有力的政客，都是政治世家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他们在地方上也都是权贵势力。这一点和德川时代并没有什么两样；其实，德川时代的情况还好一些。现在的日本，完全在国家官僚与资本的控制之下。所以我说日本是专制国家。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使日本脱离专制国家的形态？一言以蔽之，只能从代议制以外的政治行为寻找出路。所谓代议制，就是选举出代表者的寡头政治，这绝对称不上是民众参与的民主。我认为民主没办法透过议会实现；民主只能透过议会之外的政治活动，比方示威等形态的活动来实现。

小岚- 您的意见非常能激发我们的勇气。民主主义的根本，不是一张选票就能打消，也不能光靠选举制度来实践。

柄谷- 六〇年安保运动的时候，岸信介首相说了一句漂亮的话：参加安保示威的群众虽然不少，但是连着几天下来，在后乐园球场看球的观众人数更多(笑)。

小岚- 那些「无声之声」都在后乐园看棒球呢。如果把他们都拉进，示威的队伍会大增呢(笑)。

柄谷- 的确，真要说起来，参加示威的人并不算多。但是人民能够一致行动到这么强烈深入的地步，这件事意义重大。岸信介一定也感到威胁。到现在还是有人主张既然我们有议会选举制度，以示威来改变政局，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但是，如果只凭借代议制，不可能产生民主主义。实际上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示威活动；他们的选举运动本身就带有示威的性质。示威这种行为，正是民主主义的支柱。

小岚- 一九六七年为了反对佐藤首相访问越南，发生了一〇·八羽田斗争【注⁹¹】。柄谷先生曾经表示，当时抗争群众所使用的 *Gewalt* 棒【注⁹²】，应该当作一种象征；如果真的把它当作武器来发展，考虑到现代当权者的军事水平，事情会变得荒谬可笑。我虽然同意您这个看法，不过一般百姓所使用的暴力，一开始当然是石头、棍棒之类原始的器具，后来就会逐渐发展。现在反政府运动所使用的武器，不但有原子弹、氢弹，连集束炸弹【注⁹³】都有。可不可以请您谈谈这一方面的暴力论？

⁹¹ 一九六七年的「一〇·八羽田斗争」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为了阻止佐藤首相访问越南，以中核派、社学同、社青同的解放派等全学连的三个团体为中心，组成抗争部队，在羽田机场周围集结，并且首次以安全头盔与木棍武装起来。中核派部队由羽田弁天桥进攻，击败警方机动部队，在消防车强力水柱的冲刷下，仍然夺取了警备车，持续顽强的冲突。社学同、解放派的部队则由「铃之森街灯」出发，沿着高速公路进击，自六〇年安保斗争以来，首次以实力冲破机动队的防锁线，在通往机场的穴守桥上，与驻扎的机动队展开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中核派的京都大学学生山崎博昭遭到杀害，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成为学生运动再次高扬的出发点。羽田斗争之后，佐世保、王子、三里冢各地连续展开抗争，历史上称为「动荡的七个月」。

⁹² *Gewi* 棒 *Gewak* 棒指的是街头抗争时，群众所持的、当作武器的木棍等棒状物。*Gewalt* 二字来自德文，原意是暴力、权力的意思。「*Gewalt* 棒」这个名词最先出现在第一次羽田斗争，抗争群众用标语牌的木柄和镇压的军警对抗。*Gewalt* 棒与安全头盔、防尘口罩，同为日本左翼学生运动的三个重要象征。

⁹³

柄谷- 关于暴力革命，我想先说明一点：所有的市民革命(布尔乔亚革命) 都是暴力革命，因为革命所企图对抗的、之前的体制本身，就是暴力的。所有的先进国家都曾经经历过暴力革命的过程。因此，在暴力体制支配下的地区，就算发生暴力革命，也无可厚非。话虽如此，如果先进国的人民向往这样的革命，进而模仿，则是愚蠢的行为。

举例来说，我不认为在示威游行中与警察冲突、丢掷石块等等，是暴力的斗争；那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在美国的示威，也有这种现象。比方在纽约，假使发生十万人的街头抗议，一定会发生警民冲突，有些参与者会遭到逮捕。但是这种行为对政府来说，并不构成威胁。对政府造成威胁的，是这种行为背后，大量人民的反对意见。六〇年的安保，连着几天下来，参加示威的群众有数百万，这才是威胁。如果没有这么广大的群众基础，全学连那些激进的抗争，不会有任何意义。如果只是少数人激进的行为，对国家来说算不了什么。

之前我提到现在的日本没有示威，让我们更进一步来探讨。有人把日本人不愿参加街头抗议的现象，归咎于大众社会与消费社会；也有人认为网络上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与发言空间，消散了群众的力量。但这是泛泛之论，并不能解释日本的特有现象。在具有 **Association** 传统的地方，网络反而可能帮助示威活动的组织与集结。但是在日本，网络却只是使得「原子化个人」的数量增加。

小岚- 没错，就是「原子化的个人」。

柄谷- 用匿名的方式发表意见的人，在现实中不会与他人接触。一般说来，想要脱离匿名状态的欲望与政治结合的时候，有一个显著的倾向，就是容易产生排外的、歧视的运动；在政治上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但这是必然的事情，我们除了暂时容忍，没有别的办法。想要透过匿名的方式宣扬理念，是行不通的。人的「主体」是由他身处的场合或结构所形塑而成的。证据很明显：人一旦离开匿名的状态，就会立刻改变他的意见。

所以，日本之所以需要示威活动，并不是为了要发动革命；但总而言之，示威活动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需要 **Association**。从前街头抗议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根本上是因为工会的力量。安保斗争时期，曾经有过负面的中伤宣传，表示参加示威的群众每日收取报酬；其实那笔钱来自工会每个月储存的基金。劳动者在非假日参加示威活动，会有什么结果？当然是会被扣减薪水，所以工会才在事前长期储存准备。如果没有能够长期准备的团体来担任运动的核心，大型的街头抗议是组织不起来的，只会变成学生运动而已。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创立 **Association**。特别是在日本，这件事非常重要。个人(个体)将在其中受到鍛鍊而成熟。日本已经没有共同体存在了，所以我们不用担忧传统共同体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自发性地创造新的共同体。在很多其他的国家这一点是做不到的——血缘部族、宗教派别、人种组织的势力强大，甚至比国家的力量还大，大到阻碍国族形成的地步。相反地，日本的「社会」力量有必要加强。我认为这是办得到的事情。

第四章 关于文学

小岚- 最后，想请您谈一谈在文学方面的看法。您曾表示如果是关于文学的话题，就拒绝接受采访，所以我这个问题提得战战兢兢的。

柄谷- 我的确不喜欢这个话题(笑)。

小岚- 您在二〇〇五年出版的《近代文学之终结- 柄谷行人的现在》一书，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冲击。

柄谷- 标题虽然这样写，其实那本书的内容是以从《超越的批判》开始，围绕着我近年来思想工作的座谈会纪录为中心。我说「近代文学之终结」，并不是「文学之终结」的意思。我指的是特殊的文学，或者说「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文学」之终结。重视文学，给予它特别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文学批评的生命也随之终结。从前那个以文学为研究的素材，彷徨在思想上有所建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自古以来就有文学，将来文学也将继续存在吧。古时候，文学并不像近代文学那样，具有特别的价值；今后的文学也会变得像古时候一样。换句话说，今后的文学不会再像近代文学那样，被赋予特别的价值。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

小岚- 听了您这番话，我就安心了。我之所以写小说，讲老实话，是为了赚钱(笑)。就算只剩下「外型」，我想作为一种「娱乐」，小说会存留下来吧。

柄谷- 「娱乐」应该是永恒不灭的吧。

小岚- 有您这样的背书，真令人高兴(笑)。

柄谷- 不只文学方面，这个现象也同样发生在其他艺术领域。为了形成国族国家，艺术是不可欠缺的，所以在近代，艺术被赋予特别的价值。今后对国家来说，艺术仍然是必要的，所以还是会继续给予保护吧。但是对我来说，这种东西无关紧要，怎样都无所谓。

之前也提到过，我从很久以前就想离开文学了。一九八〇年代曾经一度放弃文学批评；但那时却生了一场病。因此我觉得，或许对我来说，毕竟不能没有文学。所以之后我又继续从事文学相关工作，但已经不再那么积极了。

我从事文学工作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中上健次。他总是有些什么提议。因此自从他在一九九二年过世之后，我就失去了留在文学领域的动力。只不过在他去世后，我担纲编辑他的作品全集，同时继续参加他所遗留下来的「熊野大学」【注⁹⁴】每年的研讨会，就这样和文学保持了一定的关系。另外基于对编辑者的道义，我长时间担任新人赏(群像新人赏与野间新人赏)的评审委员。

但是在一九九九年末，这些工作我全部辞掉了。不过，有些人不知道我不再从事文学相关工作，仍然继续邀约，所以我有必要发表类似声明之类的东西。那就是〈近代文学之终结〉这篇论文。

⁹⁴ 熊野大学 出身和歌山县新宫市的芥川赏得主，已故文学家中上健次(1946- 1992)构想了称之为「熊野学」的教育方式；「熊野大学」就是其重要据点，设立于一九九〇年。根据中上健次的理想，这是一所「没有考试、没有校舍、也没有校规」，「依照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个个人的志趣所成立」的学校。中上于一九九二年夏天逝世，享年四十六岁。在他离开之后，有志之士承继中上的理念，持续熊野大学的活动。每年依惯例举办夏季特别研讨会，邀请柄谷行人、浅田彰等评论家、作家、文化界人士开设讲座。

小岚- 我觉得柄谷先生离开之后，文学的状况起了很大的变化。

柄谷- 说不定真的是这样;不过不管有没有我，这个趋势都无法阻止吧。那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影响的事情。

小岚- 刚刚您提到中上健次- 他的早逝令人惋惜- 可不可以请您谈谈和他的相遇与别离?

柄谷- 一九六八年我们初次相遇的时候，我二十六岁，中上二十一岁。我们的相遇并非偶然;两个人都应征参加了「群像新人赏」(小说部门与评论部门)的甄选，都进入最后一轮。当时小说家远藤周作【注⁹⁵】担任《三田文学》杂志总编，想要快速地发掘新人，故征得《群像》编辑部的同意，阅读了进入最后一轮、却没有入选的作品。然后他从小说的部门选出了中上，评论则是我，邀请我们和他见面，希望能在《三田文学》中刊载我们那两篇落选的作品。但是中上和我都当场拒绝了。当时我们都已经开始写作新的作品。后来，我的那篇新的评论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入选「群像新人赏」。和远藤先生见面后，在回家路上的某间咖啡厅，我与中上第一次谈话。

小岚- 除此之外，与中上先生有关的逸闻或是事件，可不可以请您多说一些?

柄谷- 这样一来话题就会转到文学方面去，还是算了吧(笑)。以前我曾经写了《坂口安吾与中上健次》(一九九六，太田出版;二〇〇六，讲谈社文艺文库系列)一书，那里面大致上都记载了。

不过，既然这次的访谈是以一九六〇年之后的政治体验为专题，我想从这方面谈一谈。最初认识中上的时候，他过着类似嬉皮的生活——当时的人称为「疯癫」。另一方面，他参加了早稻田大学的学生运动(Bund派)。其实当时他是重考生，不过好像大家都误以为他是早大的学生。一九六七年秋天，他也参加了羽田机场的抗议行动。在那之后，他在羽田机场从事搬运货物的劳力工作。在这个意义下，一九六八年对中上来说，是一个原点。

后来中上和我，不只是写作小说和评论，还经常一起从事公众活动。这种场合因为个性的关系，我很容易就想「算了吧」，不太会积极主动。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做了不少各式各样的事情，这都是中上的缘故。他总是半强迫地提出各种点子，而我总是想，就稍微陪他做一点事吧——结果每次都变成我挑起责任。世人觉得，因为我自认比较会说话，所以站上台面(笑);但我觉得，其实是中上把我推上去的。

我和中上健次最后一次一起行动，是一九九一年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一次也是他先打电话给我。一开始他提议我们和安部公房三个人，一起在纽约时报刊登反对战争的广告。我表示，我们在日本对这件事什么反应都没有，因此我不想做这种事。他就说，那么我们立刻来组织一个集会。这就是那次抗议行动的发端。如果不是中上，我们大概不会有任何行动吧。集会的时候中上说：「柄谷是毛泽东，我则是周恩来。」我心里想，「亏你说得出口!」(笑)

⁹⁵ 远藤周作 远藤周作(1923- 96)，小说家、批评家、剧作家。第三十三届芥川赏得主。主要作品有《海与毒药》(一九五八，文艺春秋新社)、《沉默》(一九六六，新潮社)、《深河》(一九九三，讲谈社)等等

隔年中上就因为癌症去世;从那时起,我和文学的联系也就切断了。不过就像先前讲过的,我还编辑了《中上健次全集》(全十五卷,一九九五~九六年出版,集英社),在中上遗留下来的「熊野大学」中帮忙,没办法一下子完全停掉文学的工作。但是一直做到二〇〇八年,我也从「熊野大学」的研讨会退出。年轻一辈的人还想继续做下去,但是我不做了。我不觉得因为我的退出,「熊野大学」就会因此结束;中上健次的书,今后还会产生新一代的读者吧。我离开之后,反而更有这个可能性。如果还是由我主持,虽然柄谷的读者会来参加,但是不会产生中上的新读者。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意义了。我衷心希望能够出现一批和我、以及中上的朋友都没有关系的,中上健次的新读者。

小岚- 柄谷先生好像很喜欢「解散」东西呢。《批评空间》也是这样,大家都希望再做下去,您却把它解散了。

柄谷- 我并不是因为「喜欢」才这样做。只是我觉得,反正迟早会结束,还不如在看起来还能做的时候就先停掉比较好。至少比拖拖拉拉地苟延残喘好。

解散《批评空间》的时候,有人主张,虽然创办人是我,但是这份杂志已经成为公器,我没有权利任意地解散它。但是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只能写些无聊而没有价值的评论的家伙,没有道理跟我讲这种话」,硬是把它解散了。如果不同意我的做法,他们可以创办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那之前,我把 NAM 也解散了。那时也有人说,虽然 NAM 由我创设,但它已经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结成的组织,我说解散就解散,未免太过专制。但是,事情不是这样。我解散 NAM,是因为我已经预见到不久的将来,它会发展成难以控制的怪物。到了那时候,就算我已经离开,仍然是我的责任。所以,我除了把它解散,别无选择。再创办一个新的组织就好了。

但是,大家总是恋栈,不懂得什么时候该收手。比方新左翼的诸党派,早就应该解散;硬是存留下来,没有任何意义。像「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贡献」只不过是促成国铁的民营化、工会的解体而已。为了确保组织的存续而做出这种事来,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原本就是性喜内斗的组织,今后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因为没办法停下来,所以做下去;为了继续做下去,只好为自己找寻理由。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意义吧;但是为了这样的「意义」而存在,有什么价值?总是要在某个地方结束。能够作这种决定的,只有领导人,但是大部分的人说不出口;说这种话需要勇气。所以我从以前就一直鼓吹「革命性的引退」。如果他们退场,新的道路将会展开,这才是革命性的做法。

我曾经和一位美国的友人, MT(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谈话。作为一种比喻,我问他如果和现在的配偶相处不下去了,是「找到下一个对象再离婚,还是先离婚再去找下一个对象?」(笑)。他回答「先离婚再去找」。我也有同感。男女关系也许没办法这么简单说清楚(笑),但如果是政治上的问题,与其拖拖拉拉、苟延残喘,还不如爽快地「离婚」。换句话说,在陷入僵局、无计可施之前,把组织解散掉比较好;然后再重新思考。这样一来,一定可以有新的视野,也会有新一代的人出现。

小岚- 暂且不说要不要先离婚,真希望有新一代的人出现呢。这两天下来,您的谈话在许多方面引人深思,真的是非常感谢。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受到刺激与影响的。

【访谈后记】折服于柄谷行人先生的热情

图书新闻出版社编辑部邀请我为他们制作一系列的访谈，「以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的抗争运动为主轴，对历史作一番检证」。那是在二〇〇八年，寒气逼人的一月。

着这个机会，我提出了个人的愿望。我希望首先能够与柄谷行人先生会面。

我有我的理由。我曾在新宿的酒馆里，耳闻柄谷行人先生如何在六〇年参加安保斗争，并且为了重建共产主义同盟之学生组织「社会主义学生同盟」而奋斗。我相信他是少数能够以实践者的角度，贯穿六〇年安保与六八年这两个巅峰，俯瞰新左翼、全共斗运动与组织的，稀有的知识分子。

而且回想起来，作为柄谷先生忠实的读者，在我读过的他的著作或对谈集里，几乎没有任何直接与政治有关的谈话。我不禁想，这个访谈计划如果能实现，「不只是我，所有的读者们一定都会欣喜无比。」

柄谷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二〇〇八年三月及六月，我们共进行了两次访谈，每次都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谈到晚上十点过后。柄谷先生抱持着几乎要沸腾的热情，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将困难的理论与复杂的历史事实，分析得清清楚楚，条理分明。

六〇年安保时期，我只是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当时那样的战斗，到现在还是与我的天性不合；但或许因此，反而能够了解柄谷先生透过世界史的检证所产生的思想。

不只这样，我们一般人对国家的思考，总是侷限在单一国家的框架之内；对于经济的分析也是如此。柄谷先生让我们明白了国家的运作脱离不了与其他国家的交互关系，而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严重地不足。柄谷先生持续地关注「关系」、「连动」、「交换」这些面向，思考的格局宏大而深远。

哲学家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书中提出的「和平」的概念，总是让人觉得困难深奥，难以理解。也因为柄谷先生直接了当的解说，让我们对「和平」这个概念的背景、必然性与正当性，豁然开朗。

虽然我本身是个娱乐作家，乍听到柄谷先生「近代文学之终结」这个说法的时候，仍然忍不住心惊胆战。看了本书读者们就会明白，柄谷先生所指的是以思想、哲学为主题的纯文学。这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纯文学毕竟是引领娱乐文学前进的泉源。即使只是一缕希望也好，我对文学的未来仍抱持着巨大的幻想；对于这样的我来说，「近代文学的终结」还是让我陷入极度的不安。柄谷先生在这方面的思考，具有决定性的重量。

我一直很想知道柄谷先生对「暴力论」的看法，这一次他也具体地说明了。成功地导出这个话题，说不定是这一次访谈中，作为采访者的我，唯一的贡献。

虽然话题是如此沉重严肃，柄谷先生激烈四射的热情，以及他作为一位「单独者」【译注：单独者，在日语中指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又能与他人合作的人】对于「他者」的同理心，老实说，不禁让我充满敬意地低下头来，一股清流洗涤了我的心。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小岚九八郎
二〇〇九年三月

【附录】日本「一九六八」大事记

【附录】日本「一九六八」大事记

1953

二月一日

NH K 正式开始播放电视。

1956

二月二十四日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屆大會，赫魯雪夫發表批判史達林之演說。

五月一日

水俣病首次於媒體報導。

六月九日

日本全學連第九屆大會，宣布與日共劃清界線。

十月二十三日

布達佩斯反蘇聯暴動（匈牙利事件）。

200

十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入侵埃及。第二次中東戰爭。

十一月二十三日

日本反戰學同（Band 社學同之前身）第一次全國大會。

十二月十八日

日本加入聯合國。

1957

一月二十七日

日本托洛斯基連盟成立（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 革共同前身）。

二月二十五日

日本岸信介內閣成立。

九月九日

美國總統艾森豪簽署公民權法，保障黑人投票權。

十月一日

日本當選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1958

八月二十三日

中國對金門發動八二三砲戰。

十二月

吉本隆明發表〈轉向論〉。〈女性自身〉創刊。

十二月十日 共產主義者同盟 (Band) 成立。

1959 十月三十日 全學連發動日美安保阻止行動，全日本九十所大學、三十五萬人罷課，一萬五千人於日比谷集會示威。

十一月二日 熊本縣水俣市居民向新日本窒素公司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

1960 一月二十五日 三池煤礦工會全山無限期罷工。

四月十九日 韓國首爾發生反政府學生示威，學生革命開始。

六月十五日 反安保鬥爭，全學連在USC領導下攻入日本國會。東京大學學生權美智子遭鎮暴部隊殺害。

七月二十九日 USC 第五屆大會。分裂開始。

九月十日 日本電視台第一次播放彩色節目。

1961 五月十六日 韓國軍事政變。

七月十一日 社學同重建聲明。

八月十三日 東德政府封鎖東西柏林邊界（柏林圍牆）。

1964 十月十日 東京奧運。

1965 一月三十日 慶應大學抗議學費上漲，全校無限期罷課。

二月七日 美國轟炸北越。

四月二十四日 「還給越南和平！」市民、文化團體連合（越平連）首次示威。

1966 一月十八日 早稻田大學學費上漲反對抗爭，全校罷課。

五月二十八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

七月二十日 三里塚芝山連合新（成田）國際機場反對同盟成立。

1967 三月二日 東京文京區善鄰會館，日本共產黨與中國留學生發生衝突。

三月二日 首相佐藤榮作訪問越南反對抗爭，新左翼學生以頭盔與 Gasai 棒武裝，與鎮暴部隊發生衝突，京都大學學生山崎博昭死亡。

十月八日

十月八日 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遭玻利維亞政府逮捕射殺。

十月二十一日 全日本反越戰統一行動，一百四十萬人參加。

1968 四月四日 美國黑人運動領袖金恩牧師遭暗殺。

四月五日 捷克共產黨允許言論與宗教自由（布拉格之春）。

五月三日 巴黎大學學生與警察衝突（五月革命）。

六月四日 日本大學學生要求「大眾團交」（學生集體與校方交涉校務與社會問題之簡稱），集結一萬人示威，演變成日大鬥爭。

七月二十三日 東京大學全共鬥，佔據安田講堂。

八月二十日 蘇聯入侵捷克、波蘭等五國。

十月二十一日 國際反戰日。新宿、防衛廳（國防部）、國會周邊發生示威。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三里塚反機場示威。

1969

- 一月十八日 安田講堂攻防戰，神田地區抗爭。全日本大學抗爭激化。
- 四月十五日 「水俣病告發會」成立。
- 四月二十八日 沖繩日 (Okinawa Day) 抗爭。
- 六月二十八日 新宿西口地下廣場群眾與鎮暴部隊衝突。
- 九月五日 全日本全共鬥連合會成立大會，除了革馬派（革命馬克思主義派）之外新左翼全共鬥成立。
- 十一月十六日 阻止佐藤訪美抗爭。蒲田車站附近示威隊伍與鎮暴部隊衝突。
- 三月十四日 大阪萬國博覽會。
- 三月三十一日 赤軍派九人劫持日航班機，飛往北韓。

1971

- 六月十四日 反安保六月鬥爭。
- 七月七日 蘆溝橋事件三十三週年紀念，華僑青年鬥爭委員會控訴日本新左翼民族歧視。
- 八月四日 革馬派東京教育大學學生海老原俊夫，在中核派集團私刑中死亡。新左翼內鬥開始。
- 二月 赤軍派重信房子等人，赴巴勒斯坦。
- 六月十五日 東京明治公園，沖繩返還協定阻止集會，中核派與社青同解放派衝突，全日本全共鬥分裂。
- 八月十五日 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終止美元之金本位政策。
- 十二月十八日 土田警視廳警務部長私宅炸彈包裹爆炸，妻死亡。

1972

- 二月十七日 連合赤軍領導人森恆夫、永田洋子於群馬縣妙義山遭到逮捕。
- 二月十九、二十、二十八日 連合赤軍坂口弘等五人，挾持人質、佔領長野縣輕井澤淺間山莊，與警方發生槍戰。兩名警官死亡。
- 二月二十一日 尼克森訪中。
- 三月七日 連合赤軍內部私刑殺人案件曝光，死者達十四人。
- 十一月九日 中核派成員、早稻田大學學生川口大三郎，遭革馬派私刑殺害。

1973

- 一月一日 森恆夫於東京拘留所內上吊自殺。



柄谷行人談政治

柄谷行人政治を語る
作者—柄谷行人 (Kojin KARATANI) 訪談紀錄—小嵐九八郎 譯者—林暉鈞

出版者—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王浩威 總編輯—王桂花
執行編輯—姜佳慧 特約編輯—蘇文淑
排版製版—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地址—106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53 巷 8 號 2 樓
郵政劃撥—19546215 戶名—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702-9186 傳真—02) 2702-9286
Email—service@psygarden.com.tw 網址—www.psygarden.com.tw

印刷—彩鋒造藝印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8990-2588 傳真—02) 2290-1658
通訊地址—248 台北縣新莊市五工五路 2 號 (五股工業區)
初版—一刷—2011 年 7 月 初版二刷—2014 年 5 月
ISBN—978-986-6112-12-6 定價—340 元

柄谷行人政治を語る
Copyright © 2009 by Kojin KARATANI
Published by Toshohshun Co. Ltd., Japan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PsyGarden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柄谷行人談政治 / 柄谷行人作；小嵐九八郎訪談紀錄；林暉鈞譯。
—初版。—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11.07。
面：公分。(PsychoHistory: 005)
譯自：柄谷行人政治を語る
ISBN 978-986-6112-12-6 (精裝)

1. 柄谷行人 2. 政治思想 3. 訪談 4. 日本

570.931

100011055

